

北西新的國中

編譯 諾史·國美 思



中國的新西北

著 諾 史 · 國 美
譯 三 思

國民二十六年五月

北西新的國中

翻 不 所 版
印 准 有 權

出 版 者	譯 者	著 者
平 凡 書 店	思 三	美 國 · 史 諾

整 角 貳 價 實 冊 每

月 五 年 六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號軍進的日抗了起吹個一第軍紅↓



中國的蘇維埃人民
政府主席——毛澤東→

在陝西北部與甘肅

，亦是蘇區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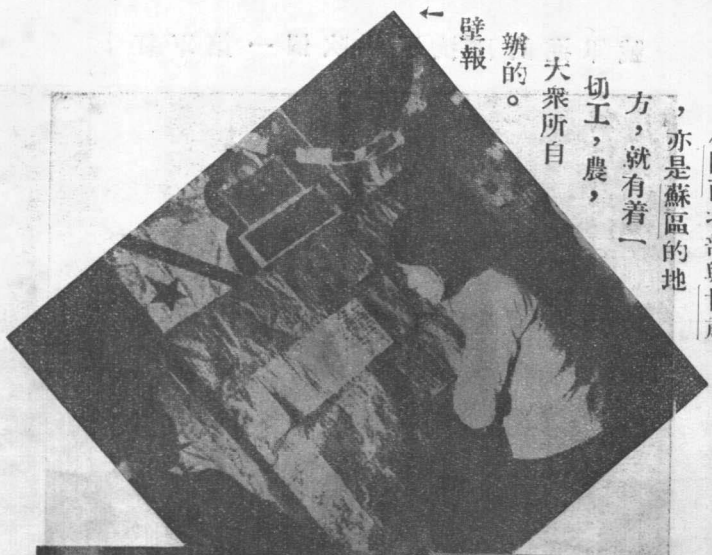
方，就有着一

切工，農，

大衆所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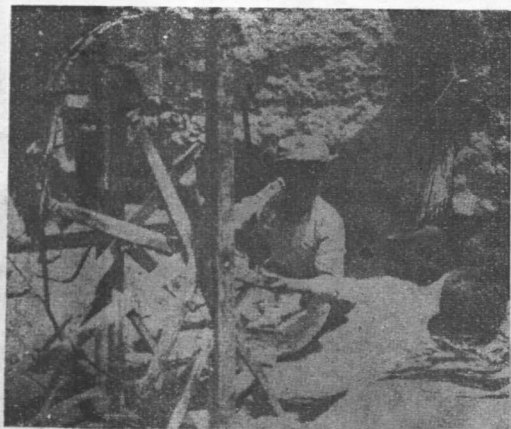
辦的。

壁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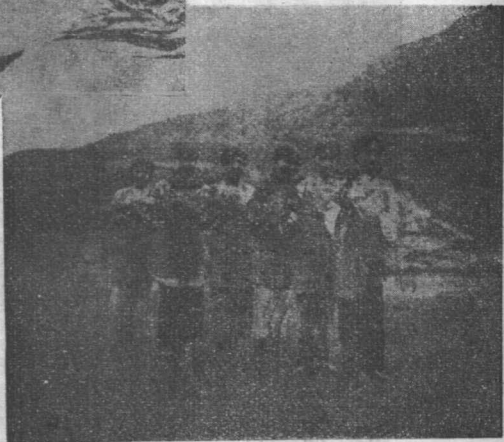


↑在蘇區，即使是最貧苦的女子，也有機會讀書。

這是一個少年先鋒隊的隊長，他正在工作着。



→ 在蘇區，到了收穫的時候，參加劇團的農村工作婦女使舉行跳舞。這些跳舞都是最新式的。



(註)所有這些照片的來源都得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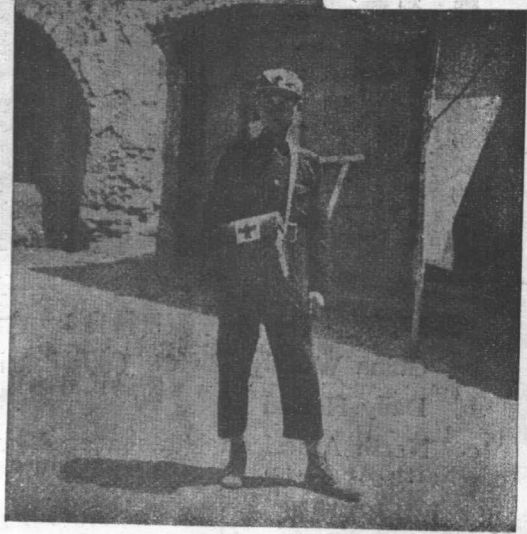
- a. China Weekly Review (密勒氏評論報)
- b. Daily Herald
- c. North American Newsqager Allianee
- d. 上海大美晚報

蘇區有着他自己獨立的

郵政局 ←



蘇區也有着他自己的衛生設備；
雖然粗劣，然而為着蘇區裏面的
每一個人民的。→



目錄

插圖

中國的新西北

第一部份……………一

第二部份……………一〇

第三部份……………一九

與毛澤東先生的談話

中國的新西北

這是一個蘇區訪問者的實地觀察的報告。作者曾將此文在北平協和教堂（Peking Union Church）宣讀。原文發表在上海英文大美晚報（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自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至五日

第一部

在現在，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已成為造成新歷史的主要課題。中國的西北正處在一個大轉變的形勢。照我看來，這是數年來中國最複雜的一個時代。這包括了最複雜的對內與對外政策，中國的前途，一定會決定於這轉變的結果，中國共產黨現在要求停止內戰，重演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的國共合作。建立民主政府，並立即對日抗戰。而東北軍和西北軍也似乎完全贊同他們的主張，發生同樣要求，這共產黨的政策應當如何解釋呢？並且這是不是一新政策呢？

我覺得現在需要敘述一下最近的歷史來了解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現狀的成因。但我不願意，從大家所熟悉的國民黨的立場來敘述，而願將我在蘇區所得的告訴大家。

中國共產黨是在一九二〇年創立，在一九二三年，孫中山與蘇聯駐華代表越飛成立了協定以後，共產黨便很快地發展。不久國民黨便改組而與共產黨聯合，共產黨也就成為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偉大的民族革命的活躍者。

這次合作的基礎是建立在孫文與國民黨的接受二大原則上的。這二大原則：一是認

識在對外需要打倒帝國主義，用革命的行動求恢復政治上領土上和經濟上的完全主權；第二，是要求一種反封建的對內政策，就是實現一個反軍閥反地主的民主革命。並建立一個社會經濟生活的新方式。在後一點上，共產黨與國民黨對此共認爲必須在性質上是布爾喬亞民主式的。他們又同意這些革命的目的必須在民主的代表制的共和國的機構裏面才能完成的。當然共產黨認爲民主的布爾喬亞革命的成功是任何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必然的前提。所以他們促成和支持這運動是完全合邏輯的。

國共在一九二七年分家。照共產黨講，分家之後民族革命運動也隨着中止了，那時新軍閥支配下的國民黨的右翼，脫離了合法選舉的武漢政府，而在南京成立新組織。共產黨和大部份的國民黨便指出這是對布爾喬亞革命的反革命。

國民黨內部不久便妥協於南京統治，而共產主義便變成一個該死的罪名。共產黨被驅逐到地下去了。共產黨的民族主義的兩大政綱——反帝和反封建——也被拋棄。而隨着發生了鎮壓土地革命的大規模內戰。無數共產黨員被殺害了。以前農民和工人組織的領袖都被殘害。而工農組織也遇到了空前的摧毀。軍閥獨裁代替了民主制度。造成了以武力剷除異己的無數內戰，然而仍舊有不少共產黨員留在軍隊中，他們在這恐怖時期中加強了自己的連絡。

一九二七年八月，南昌發生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一次暴動。最有興趣的就是這次事變的領袖是共產黨員和蔣介石所辦的黃埔軍校的激進學生。他們仍舊打着國民黨的旗幟。仍舊信仰三民主義，而反對南京政府的出賣國民黨的革命政策。接着南昌事變後，發生了

陸豐，汕頭，廣州等地的暴動，漸漸地這些暴動者都聚集在江西和湖南的山嶺間。共產黨員告訴我，當時的領袖都是黃埔軍官和激進學生，工人，農民等。在共產黨看來，當時是一個不鬥爭便滅亡的交叉點，而這些小小的一羣，便決定鬥爭。

一九二八年共產黨正式斥責國民黨爲無希望的反革命黨。他們開始在江西和湖南用自己的紅旗正式自己担任了中國工農民主革命的前衛。他們主張保衛原來民族革命的兩大政策和三民主義的活的意義。當一九三〇年第一個赤色政府在江西成立的時候，並不稱爲社會主義的國家而是工農蘇維埃共和國，在性質上是布爾喬亞民主性的；在俄文裏「蘇維埃」一字的意義是「議會」，是一種代議制政府的特別方式，無論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社會都可適用。俄國在一九〇五年最初用蘇維埃制度，而在布爾喬亞克倫斯基時代發展起來成爲羣衆代表組織的形式。

從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年，紅軍發展得非常的快，起初只有幾十枝來福槍，而赤色游擊隊在湖南和江西建立了幾千農民軍隊，他們奪到的國民黨軍隊的武器來武裝自己。到一九三〇年他們已造成了一個極堅強的力量，甚至國民黨開始了大規模的「圍剿」。從那年起國民黨便繼續努力于「勦滅赤匪」。

國民黨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次的「勦赤」都失敗了，每次紅軍都整個解決了他們的旅或師。這些進攻實際上補助了紅軍的武器和增添了紅軍的補充隊，結果使紅軍的區域增大了，紅軍常常把「白軍」幽默的稱爲「我們的軍械輸送隊」。我在蘇區的時候，他們給我看了不少奪獲大批軍械的照片和寫着「送給共產黨青年的禮物」的旗

戰。毛澤東自己告訴我：紅軍在華南時，曾俘虜和繳械了三十萬中央軍。一直到國民黨進攻紅軍的第七年，所謂第五次「圍剿」時，才有相當的成功。第五次「圍剿」開始在一九三四年，適當代表九百萬蘇區人民的第二次中國蘇維埃大會在瑞金——蘇區首都舉行以後。這時蘇維埃中央政府統治了大部的江西，福建和湖南。還有幾處地域上不相連接的蘇區在河南，湖北，安徽，湖南和四川。

在第五次「圍剿」中，蔣介石動員了九十萬軍隊，其中四十萬是採取攻勢的，蔣介石採用了新戰略，盡量利用了他最大的軍備，優越的資源，技術的軍械，和機器化的戰術。大部份的南京政府軍隊都在包圍蘇區，多少保持了固定的地位，實行經濟封鎖。這次戰役，蔣介石化了鉅大的款子，建築了幾千里軍用公路和幾千個小碉堡，這些碉堡都可以用機關槍互相連絡，他的防禦式的進攻想限制紅軍的遊擊戰術，因為紅軍軍械較劣，人數較少，不能運用陣地戰。

蔣介石的策略在第五次「圍剿」中發生了效力。他造成了一條長城圍住了蘇區，逐漸向裏推進而縮小圍困的面積。他最終的目的想圍住了而撲滅全部紅軍。蔣介石很小心地不使他們的軍隊在公路與碉堡外暴露。他的軍隊除了在重砲，鐵甲車，坦克車，空軍轟炸毒氣等掩護下，不敢進攻，他們這些戰術，使紅軍不能運用遊擊戰。蔣介石的軍隊除了在碉堡中，是不肯與紅軍接觸的；因為在碉堡中，他們源源不絕的接濟，而能定操勝算。

這第五次大進攻，據說是蔣介石的德國顧問 Von Seeck (薛克脫——最近死去) 等

所計劃的。Von Seeht是納粹軍隊中參謀部長，蔣介石的首席顧問。

雖然蔣介石的新戰術是非常慎重，但是太靡費和太慢了。所以是難有結果的。這第五次「圍剿」遲延到九個月之久，南京政府軍始終沒有給紅軍的主力軍以致命的打擊。但封鎖政策却發生了嚴重的影響。蘇區漸漸地感到抗戰的資源不足。南京也相信這方法可以消滅紅軍了。並且以為紅軍被圍困住了，一定不能逃出這陣線。好多萬農民被炸彈和飛機上機槍所慘殺了，也有不少優良的紅軍將士被毀滅了。可是他們告訴我農民被殺的數字比紅軍不知要多少倍。照我在西北時的觀察，這句話的確不錯的。上海有名的銀行家章乃器在「大眾生活」上估計第五次大進攻的費用連一切直接參加戰爭的武力和一切間接的財產損失，告廢，破壞的市鎮等在內，大約要化八萬塊錢才能殺死一個紅軍戰士。結果第五次「圍剿」就他的目的說，還是失敗了。因為它的目的是想毀滅紅軍的生命力，紅軍在瑞金開了一個軍事會議決定很技巧地撤退，把紅軍的主力軍搬到新的根據地去，這計劃實施了一年是完全有效地勝利了。在這撤退的時期中紅軍表現了他們的優異的天才。比之他們向白軍進攻時更顯得優越。因為指揮一個勝利的前進的軍隊是一件事，而在種種困難下退却以達到長征西北的成功，又是一件事。

紅軍從江西的撤退非常秘密而迅速，差不多九萬主力軍在離開他們原來的防地數天以後，蔣介石軍隊的指揮部方知道他們的行動。紅軍在江西東南部動員撤退全部正規軍而以游擊隊員來代替他們的防守。這種行動大都在晚上舉行，當紅軍在瑞金差不多全部集中後，於是開始下令偉大的長征。他們化了三個晚上將軍隊向西迫進，到第四天出

乎意外的迫進湖南廣東的碉堡線。他們以襲擊的方式，奪取碉堡，使得敵人在無上的驚異中逃走，他們並不停止，繼續前進，直到完全佔領全線的碉堡和壕塹。如此開闢了他們到西南去的道路。

紅軍衝入湖南之後，開始了他們的長征，這段歷史是太偉大了，我不能用幾句話來敘述它。共產黨中有幾十個人合寫了一部三十餘萬字的長征記，但是還沒有敘述完全！我現在只能簡略的做一個報告，他們在前進途中，常常被追軍的威脅所困，常常被空軍的飛機所轟炸，差不多每天遇到一次戰役。紅軍走過了湖南，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四川，西康，青海和甘肅。最後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紅軍第一軍的先鋒隊到達了陝北，而與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紅軍會合。在陝北，他們在一九三三年已建立了蘇維埃區域。

這次長征自福建省最僻遠處開始，彎彎曲曲地一共走了二萬五千里路，無論一個人對於紅軍和他們所代表的政治主張如何，都能够認識這次長征的偉大而能成爲軍事史上的偉績。Hannibal's 越過 Alps 的行軍和這長征一比，不過像一個普通的遠足而已。就是拿法國拿破侖的從莫斯科退兵的行軍來比，也比不上，因爲拿破侖的軍隊是被擊潰而軍心渙散。

紅軍這次的長征無疑的是一個戰略上的退却，這次不是烏合之衆的潰散。他們到西北的最後目標完成了在這征程之中，他們的核心始終沒有遭到攻擊。而他們的精神並未受打擊。他們的政治信仰更一直是堅強的。紅軍的每一個戰士都相信他們是向抗日戰線

上前進。這是堅定意志最重要的因素，這因素使他們從潰散的可能傾向中轉變成為光榮的前進，歷史指示他們用抗日作為鼓勵士氣，到西北去，確使他們走近了抗日的前線。使他們可以造成一個決定中國，日本和蘇聯命運的偉大功績。

這種驚人的長征，我們必須把這個技巧的領導認為高明的政治策略。這個驚人長征的成功，多半由於這種技巧的領導。這次長征告訴我們，共產黨員越過了世界上幾個最高的山道，渡過了中國最深的河，跨過草原和半沙漠，經過番民的廣大土野，並跨過了青海的大草地，在那裏五天沒有得到糧食，沒有人烟。

紅軍的長征是如此偉大的，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紅軍在西北的情形。現在我要趕快講到我訪問蘇區的事情了。

我在去年夏季的七月初到達陝北的保安，留在蘇區內直到十一月底。用他們的正式名稱說起來，保安是中國人民蘇維埃共和國的臨時政府首都。蘇區包括大部份的陝北，清水河（譯音）以東的。大部份的甘肅以及西蘭公路的北面，並有大部份在黃河以東及長城之下甯夏的東南角。

我在保安就攔了約一個月。在馬背上，在路上共四十多天，餘下的時間用在觀察蘇維埃機關及甘肅，甯夏前線的紅軍。在那區域中我幾乎和全部重要的紅軍領袖相遇過，我同紅軍的兵士游歷了許多天，在農民的茅屋中，甚至在保安的蘇區外交部中睡過。我和許多的農民，工人，兵士，小孩談話過。那些小孩們都被紅軍組織成赤色先鋒隊，最小的孩子則屬於兒童團。

在這個時期中真是見多識廣。可是我還沒有時間能把這些全部溶化起來。所以我所能告訴你的，僅是根據了我的印象和所見的事實分成下列四部份。第一，蘇區的社會和政治組織，第二蘇區的經濟，第三紅軍的特質，第四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我所說的不過是一種赤裸裸的大綱。孔子曰，「舉一隅而三隅反」，即此便可類推了。

我所以把社會和政治組織連結在一處是因為在我認為這在蘇區中是難以分開的，爲解釋這一點，我可以舉出一個親身得到的經驗。當我入蘇區時，我有幾天經過沒有人烟的地方，只有一個騾夫相伴，在這前線地帶常爲民團所侵擾，他們靠了地方的幫助常常闖入蘇區，放火掠奪搶劫，並帶去俘擄。他們都是純粹的，簡單的土匪。

有許多民團望見了我，他們就追我。在某處他們僅在我後面幾里，不過因我所走的是多山的鄉下，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一個少年先鋒隊的農民家小孩看見了這種情形，他穿過了一條山徑，去警告紅軍的前哨，他說有一個帝國主義者帶了百多個土匪侵入蘇區。紅軍立刻出動反逐，用埋伏法去襲擊民團，並且驅逐了他們，直等到我在當天晚上到達An Tsai時，我方知道了這些事。紅軍赤衛隊的領袖告訴我說：「我僅以身免」幸喜他們並不相信我是領率土匪。

這個幼小的少年先鋒隊的忠誠可以說是在蘇區內農民對於担负起政治和社會責任的典型。這正和中國別處農民作了一尖銳的對比，在別處地方的對於自己門外所發生的事的格言是：「我不管」。

若你從蘇區經過時，你可以常常被從田野中走來的農夫或小彆，有時或且是老婦人

叫住了詢問你的通行證。並且你所碰到的農民，幾乎完全可以和你說幾句基本的政治，至少是關於他們自己區域內的事。在許多村落中常有一兩個了解中國現在的政治形勢，知道日本帝國主義的歷史，蘇聯的許多事情和一些對於英美的概念，並且能夠和你談論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像當我在蘇區旅行時，西南事件正是一個國內問題，而西班牙戰爭正是一個國際問題，我所遇到的許多農民以關於這些事件的聰明問題來問我。遠居在窮鄉僻壤的他們很知道這些事件。這些事他們曾在村莊中集體討論過的，或從蘇維埃的新聞紙中讀到過的，或從蘇維埃的無線電聽到過的。我記得我會遇見過一個老年的山民他對於阿比西尼亞極感興趣，他曾問過我幾個問題，從這上面可以證明他自己對於這件事會研究過。

誠然，這些農夫不過是特別的。一般的人僅有對於純粹的地方事件的政治意見。

政治上說，蘇區是根據蘇維埃制度而組織起來的。從農村到中央各有一個代議政府這種組織的機構如下：村蘇維埃，區蘇維埃，縣蘇維埃，省蘇維埃以至中央蘇維埃。每一個村莊選出他們的代表出席高級蘇維埃，這樣一直到全蘇大會。

第二部

(二月四日)

每一個區蘇維埃之下，有各種的委員會。有一個權力極大的革命委員會，由公開的羣衆大會產生的，在某些條件之下，可以號召區蘇的重選，在蘇區之下由它任命的委員會有：教育，娛樂，擴大紅軍，合作社，軍事訓練，政治訓練，土地，公共衛生，游擊訓練，革命防衛等等。這些委員會在各級蘇維埃一直上至中央蘇維埃都是有的，但政策的配合，國家議案的決定，都是由中央蘇維埃主持。

不過組織人民的範圍並不僅限於政府的機構而已。共產黨在農民工人城市鄉村間也有廣泛的委員。此外還有共產黨青年團以及它所領導的兩個青年組織。先鋒隊和兒童團。共產黨也組織婦女於共產青年團，抗日會，看護學校等等的組織之內，成年農民的組織有貧民會，抗日會。甚至於昔日秘密結社的哥老會也包括於蘇維埃組織之內。他們在赤色區域內可以公開成爲合法團體，并獲得工作。農民隊游擊隊也是深入的政治社會組織機構的一部份。

這一切的組織和委員會的工作都由蘇維埃政府，共產黨，與紅軍所配合。在簡短的談話內難於將這些組織複雜的有機聯繫說明，不過我們可以說，一般的這些組織都極廣泛，其目的是使每一個男女老少都是某種組織的份子，并去執行一定的工作。這個制度的高明處所，就是在於一切工作很少是由紅軍或政府以威力直接規定人民去做；但經過人民組織自身的社會壓力，使人民自動地有所貢獻於社會。國家的一切活動因此趨於形

成政治工作人員與人民合力進行的事業，而潛藏於羣衆中的精力，智慧，愛國熱忱，經濟力量等都獲得充分的利用。

但農民對此的感覺是如何的呢？中國農民素皆被認為憎惡組織，訓練，尤其家庭以外的社會活動。我可以回答凡和我談過話的農民似乎都擁護蘇維埃和紅軍。自然關於向一個「洋鬼子」回答的誠意，也許有點疑問。不過事實上許多的農民并不把我看作「洋鬼子」，蘇區內有的是中國各地，南自廣東北至滿州來的人，說的是各種奇特的方言，外表也是各式各色，而許多的土著也祇拿我當作另外的一種「中國人」而已。

我曾在各種情況之下和農民工人士兵單獨談過話。他們之中的許多很自由地批評政府，但如果問他們到底歡喜蘇維埃政府比國民黨多些嗎？他們的回答總是肯定的。「是的！」我還注意了一樁事，許多農民談到蘇維埃都稱之為「我們的政府」，這使我驚異，因為這種談話的口吻在中國是新奇的。不論對於某一些事，他們或不要訴怨他們，對於紅軍似乎都有一種極真誠的情感。

還有一樁有趣的事，可以看出紅軍的基礎是在人民廣大的羣衆之中。這就是所有老的蘇區都差不多完全由農民自己來警衛，在蘇區內沒有真正的駐防軍隊，軍隊的戰鬥力都集中在前線上。警衛完全交給村民，由革命防衛團，農民赤衛隊，游擊隊分別擔任，比方陝北許多部份的前線都完全由這些組織所防衛着。這個事實也可以證明一些紅軍在農民中的獲得人心，因為紅軍并不是建立來充壓迫剝削的工具，而普通是在前線上鞏固新區域並應付敵人的攻擊。在另一方面，農民深入的組織創立後防人民中的防衛和根

據，使紅軍無後顧之憂，專心發揮它在前線上的活動力。

批評看來不受鉗制，蘇區到處你所看見的壁報的論文小說，都是批評訴說的文字。批評的文章，和頌揚的文章一樣，受着獎勵。

但如要真正了解農民對於共產運動的擁護，必須研究蘇區的經濟。在我討論這個題目之前，最好先將蘇區在西北成立以前的情狀略述一二。

我要引用國聯專家斯坦巴博士 Dr. A. Stangor 最近著述的「西北各省及其發展的可能」。

斯氏提及前幾年西北的饑饉，指出陝西某縣經過調查人口死亡達百分之六十二，另一縣達百分之七十三。他並引用官方的估計，指出單在甘肅一省餓死的就有兩百萬。我隨意再引些斯氏所述，來表示西北國民黨區域的狀況。

「在一九三〇年的饑饉中，賣去二十畝田祇能買三天的糧食。利用這種機會。省內有錢的階級大置產業，自耕農的數目大大減少。許多土地都荒蕪了，許多土地都集中於地主和官吏的手中。甘肅尤其有許多大塊可耕種而任令荒廢的田地——田地在一九二八年到三〇年的饑饉中，地主可以用極低的價目購入，地主從那時起都發了財……。」

「在陝西以不出土地稅為榮，富足的地主往往免稅。還有一點尤為農民所不願的就是在逃荒期間的土地稅也必須繳付，否則農民就不能再享有其原有的土地。」

至於國民黨甘肅，斯氏曾言：

「甘肅過去五年平均的稅收在八百萬元以上。這比中國最富足之一向稅收最重的浙

江還要重。官吏可以中飽極多，這是足見農民付出稅額之高。此外除省，縣政府所徵收的，還有軍閥征收的也應加上，這在甘肅據官方的估計約在千萬元以上。另外人民還要負擔地方民團的費用，這些地方民團，有的墮落得和流氓一樣專以魚肉鄉里爲事。

關於這點我不能說得太長，不過我還引用甯夏省政府公報的一篇文章裏面列舉在馬鴻逵統治下國民黨在該省所徵收的各種稅捐，包括買賣捐，家畜捐，略駝捐，連鹽捐，鹽的消費捐，煙燈捐，羊捐，商人捐，看門捐，鴿捐，土地稅，中八稅，特種食物捐，土地附捐，屠宰稅，結婚稅，榨油捐，磨房捐，木材柴蔬捐，這個表，決沒有將各種雜稅完全列出而一點也沒有遺漏，不過够使我們知道在那些境內，人民或許對於國民黨沒有甚麼愛好。

共產黨在蘇區內爲了佃農，貧農，中農已經將情狀劇烈地改變了。在新的蘇區第一年甚麼捐稅都一概廢除，祇第二年起徵收少量統一的土地和營業累進稅。再則無土地的農民分得土地，荒地開墾。這使我們立刻想到蘇區的土地政策。重分土地是赤色政變的基本原則。但沒收土地是怎樣執行呢？

共產黨把鄉村人口分爲以下幾類：（一）大地主，（二）中小地主，（三）富農，（四）中農，（五）貧農，（六）佃農，（七）農工八材，（八）產業工人，（九）流氓無產階級，（十）自由職業者，包括教員，醫生，技術人員等等智識份子。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西北蘇區公佈的土地法，規定沒收一切地主和富農自己不耕種的土地，不過地主和富農都被允許保留儘他們自己的勞力所能耕種的土地。在土地有剩餘

的地方，西北這種區域極多，自己耕種的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在實際方面並沒有沒收，祇有荒地和業主他去的土地才分配，有時好田要經過重分，歸貧農所得，地主祇分得同量的壞田。

地主的定義是什麼呢？照蘇維埃的解釋，凡主要的收入靠租地與別人以博取地租，而不靠自己的勞動的，即是地主。根據這個定義重利盤剝者也屬於地主一類，而得着類似的待遇。在西北據斯坦巴博士的統計，以前高利貸的利息達百分之六十，在緊要的時候還不止此。他舉出一些例子，指出農民償還了和原來借款相等的金額兩三倍之後，仍要繼續擔負較原借款項大得多的債務。在陝，甘許多地方雖然地價非常的低微，實際上農民沒有資本想積點錢買點田地是不可能的。我曾問過甘肅的佃農，他們過去雖移墾該地十五年之久的，都不能積點錢自己置點田地，雖然當地的地價祇要兩塊錢一畝。

除上述的階級以外是不沒收土地的。貧農，佃農，僱農都獲得充足的土地以謀生計。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政策並沒有「平均」土地享有權的企圖。目前蘇維埃土地政策根本的目的是供給每個人充分的土地，保證他和他家庭的適當生活，因為這似乎是目前農民階級最緊迫的要求。

土地沒收和重分的問題在西北是很較簡單化的，因為大量的田產都是以前屬於官吏，稅吏，和離開當地的地主的。在許多例子中，沒收了土地之後，貧農的當前要求都滿足了，並且與未離開的地主和富農沒有很多的衝突。因此蘇維埃不僅因給予土地而從貧農無土地的農民獲得支持的經濟基礎，而且因廢除了捐稅剝削獲得中農的感謝，以

及在抗日運動的基礎上在某幾個例子方面獲得小地主的援助。陝西有幾個超出的共產黨黨員是由地主階級出身的。

此外對於貧農的幫助還有很低利息及不要利息的借款。高利貸自然完全廢除了。去年陝西的農民都分得原價的棉籽及麥種。紅軍兵工廠製造了好幾千農具分給沒有土地的農民開墾。在保安設立了一所初級農業學校，而我聽說現在正計劃設立一所畜牧學校，祇等由上海去的專門家到後就可以開講。

文化和經濟方面，陝北以及甘肅，甯夏以前自然是中國最落後的部分，沒有機器工業，紅軍到了之後許多區域才第一次看見報紙，在吳起鎮 (Wu Chi Ch eng) 管理工廠的一位工程師，是外國訓練回國的，他放棄了在上海一千塊錢一月的職位，來到蘇區絕盡義務服務，他在當地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物，因為他製出來的木炭燃燒引擎是該地農民從沒有見過的。

赤區工業自然是非常原始的，包括造紙，製革，棉毛紡織，軍服鞋子工廠，兵工廠，機器廠。這些企業的許多簡單機器都是從江西一直帶了過來的。許多是去年在山西獲得的，有些是私運進來的，共產黨經營了延長的煤油井，據他們說他們增加了比以前任何時代還多的牛產量，他們製了很好的蠟燭，在他們的合作社有得出賣的。

甘肅，甯夏，陝西蘇區都已設有合作社。我聽見說，在江西的時候，他們有一萬個合作社，五十萬合作社農民社員。僅在江西蘇區模範縣的甯都據說就有兩里長的一條街完全是販賣各種物品的合作社。在陝西我聽說陝，甘，甯蘇區一共有四百個合作社。

這是經濟委員林伯渠告訴我的，林齊巧是一位極有趣味的老先生。他以前和孫中山先生同是同盟會的創造者，後來又是國民黨的一個創造者，一九二六年他是國民黨的財政部長，中委，比蔣介石的資格老得多。一九二七年分裂之後，他加入共產黨以迄於今日。

林伯渠也隨着大軍從江西出發西征，走了七千多哩路露着笑的容顏和白的鬚髮，極像聖誕老人，與極端年青的蘇區一般印像相映，非常動人。我非常喜歡他。在蘇區像他這樣年老的人還有三四個，以前在國民黨的位置也高，他們都是在五十歲之後丟棄了一切——家庭、朋友、廬舍、財產，來加入革命，並且相信紅軍是在領導這個革命。林伯渠是健在的幾個年紀大的八們中，曾在兩個極端不同的社會中執過高的職位的：滿清統治下的封建帝制主義和蘇維埃之下的共產主義。陝西蘇維埃政府的祕書長謝覺齋也是另外一個，他在前清的時候是一個秀才。

我很抱歉因為時間的限制，我不能更詳細的述明蘇區的經濟組織，現在我要討論紅軍本身，這個題目，我相信，是諸位最感到興趣的，我們必須要記得這一切蘇區的社會政治經濟的組織都是臨時性質的。即在江西的時候也是如此，因為自從蘇區開始成立，它一直就要以戰鬥來求生存。我們不能將今日在蘇區所見的認為是一種完成了的社會實驗。我們應有的正確認識是這樣的，蘇區的一切還是沒有完成的革命的一幕，而蘇區本身僅是紅軍擴大更大規模的革命的根據地。

今日的紅軍不僅佔着它歷史上最大的整個相連的一塊蘇區，而人數上也是大於這個區域以前的時代，或許僅比江西紅軍的全盛時代差一點。去年十月初朱德、賀龍、徐向

前，張國燾所部從四川，西康突過南京部隊的包圍線，所有的紅軍主力都在甘肅勝利地連絡起來了，而大大擴大了紅軍在西北的根據地。

紅軍經過了改編，現在有三個方面軍，即第一，第二，第四方面抗日紅軍，除這三部基本隊伍之外，在陝西還有東面軍，以及成于成萬的赤色游擊隊，赤衛隊，農民自衛隊等。

我估計這三個主力部隊合起來的力量為九萬到十萬人，這些軍隊多半都有新式來復槍，他們也有自動步槍，機關槍，輕砲隊，所有這些看來都是繳自敵軍的。紅軍還有兩師騎兵，馬都是甯夏產，在戰爭中從馬鴻逵的手中奪來的。他們都是技術專家，並且是中國唯一受了訓練能以大刀應戰斫殺敵方馬隊的騎兵，還有一支回族紅軍，並有許多蒙古人組織成的游擊隊伍已在甯夏及綏遠武裝起來了。

這些都是所謂之「殘餘赤匪」。對付這些「殘共」蔣介石總司令於去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的前夜，還在打算再來一個第六次的最後完全剷除的圍剿。

我要告訴諸位關於紅軍許多我看來很有興趣和意義的事實。這些事實都是我和紅軍第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楊尚崑，一位二十九歲的青年的談話中所獲得的。

第一，許多人想像中的紅軍，是一些冥頑不可理喻的狂而走險的怨望之輩。從我所觀察的看來，這是錯誤的概念。紅軍士兵的大部份都是青年工農，他們相信他們是在為他們的家庭土地國家而戰，在多數事實方面，這也是的確真的。紅軍士兵平均的年齡僅十九歲。我的感想認為心智和體力方面，他們是十足的青年軍隊。這些青年都深深的

爲一種主張和使命所薰陶了，他們也是極端愛國的。設或你問他們，爲甚麼要幹紅軍，他們普通回答你說，因爲第一他們要打日帝國主義，第二他們恨地主及高利貸者。

彭德懷所率領的第一方面軍，其中百分之廿五是農村工人（包括手藝工人，驛車夫，學徒，僱農）百分之三是產業工人，百分之五十八是農民，百分之四是小資產階級如智識份子，小地主富農的子弟。在這軍裏面，百分之五十以上 士兵和指揮員都是共產黨黨員或共產青年團團員。大約百分之七十的士兵能讀，能寫簡單的信件，文字，標語，傳單等，（地方部隊的百分數較低）。這比陝西農民的識字平均百分數要高得多，當地人口不識字的約爲百分之九十五。紅軍士兵從入伍的一天起就學習識字，有特爲他們預備的課本，並且每天有政治演講。

這些士兵，和他們的指揮員一樣，並沒有薪餉，但每個士兵都有土地，從土地可以獲得收入。軍隊供給他們的伙食，衣服，毯子以及別的必需品，個別士兵從來不會執行沒收的工作，偷竊別人的私有物品是要從嚴處罰的。士兵買東西必得給錢，帽幪小商人小販是禁止的。在蘇區我所看見鎖了門的祇有蘇維埃政府的文件保管處和赤色兵工廠以及軍火儲藏室。我曾在各種生疏的地方和農民停留在一起，但我從沒有失掉任何一件東西。

第三部

(二月五日)

地方獨立隊部以省籍來分。計山西，陝西的土著爲百分之五十四，河南百分之十四，安徽百分之十三，湖北百分之九，江西百分之二，東北百分之五——六。在三個方面軍裏面，南方人的百分數大得多，第一方面軍還有許多苗，羅羅，回族的士兵和排長。第二第四方面軍有許多西藏人和蒙古人。

紅軍指揮員的平均年齡是廿四歲。這包括排長以上迄於軍長。幹部從營長以上都是黨員，僅祇一兩個例外。所有連長以上的指揮員都是識字的，雖然有幾個我所遇見的一直到參加紅軍之後才開始學習讀寫。團長以上的指揮員，雖都年輕，平均每人都有了八年戰鬥經驗。在紅軍指揮員以及蘇維埃工作人員之中，有些是黃埔學生，大，中學畢業生，舊國民黨官吏，舊東北軍將領，以及留學法，英，德，俄的學生，但我祇遇見一個留美學生。

大多數紅軍的士兵，指揮員也一樣，都是未結婚的或「離異」了的。這是說他們已拋棄了他們的妻子和家屬。我好幾次，懷疑他們這種「離異」或許與他們的堅欲加入紅軍不無關係。紅軍自己不稱自己做兵，但自稱爲戰士。我感覺得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這些紅色戰士都仍是聖潔的童男，在前線上女共產黨員很少，有也是獨身的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或已與其他蘇維埃工作人員結了婚的。據我所看見和知道的紅軍待遇農村婦女都有禮貌，農民對於紅軍的道德，看來也極贊許。我從沒有聽見奸淫侮辱農村婦女的案

件。

很少很少的紅軍戰士抽煙喝酒。紅軍第一方面軍指揮彭德懷，他曾充國民黨的軍官，有一次解釋給我聽，紅軍之所以能耐苦正因為它是極端年輕，這使求異性的問題也不頂嚴重。彭本人自從一九二八年領導國民黨叛變加入紅軍之後，就一直沒有看見過他的妻子。紅軍指揮員的傷亡數很高，他們從團長以下在戰陣上習慣是與士兵一起作戰的。在國民黨第一、二次圍剿的時候，紅軍指揮員的傷亡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但這種犧牲太大，以後便採用了種種戰略減少有經驗的指揮員的傷亡率。不過在江西最後一次的五次圍剿中，紅軍指揮員的傷亡平均仍有百分之廿五，在今日的蘇區你可以看到許多的證明青年廿五歲左右的，脫了手臂，手指被轟去了，或頭上身上露着極難看的傷痕，到處都可以碰見，但他們仍在爲革命而爭鬥。

在紅軍裏面每天自然有體力的，智力的，軍事的，社會的，政治的，訓練課程。遊戲方面如跳高，跳遠，爬牆，賽跑，等等的競賽都受着鼓勵。每天兩點鐘的認字是必修科，課堂是排或連的俱樂部，排長或連長就是教員。還有練習射擊，騎馬，術科，刺槍，步伐等等。此外就是幾個鐘頭的娛樂，如遊戲，唱歌，寫壁報，各種的讀書會等。

實在說來紅色戰士的生活並不壞，照我看來，他們一半的時間費在唱歌方面，他們實際上有幾百首歌，而正不斷地在寫出新的。在紅軍的營幕中，你差不多時常看見整排整團在那裏練習唱歌。唱歌也有競賽，最會唱的可以獲獎。你信不信我不管，他們實在唱得好，在半夜聽來胆寒，當游擊戰的時候唱來威武。我在遇見一位端肅的工程師，他

說他對紅軍的批評就是「他們花在唱歌的時間未免太多了。」

我實在相信，我所遇見的紅色士兵，差不多是我在中國所見到的最快樂的貧民。他們的生活自然是很艱苦的：平淡簡單的食物，不好的衣服，重疊的險阻。但每人的待遇一律，從朱毛彭德懷以至下級士兵都如此，這對於整個軍心的影響至非我所能描寫。吃苦，物質上的不舒服，如普通平等都如此，很能在較高的水準上推行，甚至於可以增高革命戰士羣衆的士氣。

在我的參觀經過中，給我無限驚奇之一的，就是我和少年先鋒隊的會見。參加紅軍的先鋒隊，大家都喊他們做「小紅鬼」，並且每個人都愛他們。每處駐紮紅軍的地方，差不多都有一排共產青年團所組織的這些「小鬼」，他們都是從十二歲到十六七歲的青年，來自中國各處。許多都在長征中走了八千哩路，許多是紅軍最近出征山西才加入的。他們充傳令兵，信差，號兵，水夫，馬夫，看護，書記。

我記得在甘肅遇見一個這樣的「小鬼」，他們叫他「山西娃娃」。這個孩子是山西洪洞縣某市鎮的一個學徒。紅軍到了那裏，他和三個另外的學徒爬牆逃出加入紅軍。我不知道他是怎樣決定，他應加入紅軍的，不過極明顯的，閻錫山的一切反共宣傳，以及他的長輩的警戒，都祇產生恰恰和原來希望相反的效果。當我問他爲甚麼加入紅軍，他回答說：「紅軍是替窮人打天下的。紅軍是抗日的。爲甚麼一個人不應當加入紅軍的士兵呢？」和紅軍一起的有許多像他這種孩子。

在甘肅同一個城市裏，我還看見和這種孩子成對照的，紅軍中最老的一個老頭子。

他也是山西來的，年紀有六十四歲了，曾在山西南部某市鎮賣肉。我看見他的時候，他充任紅軍的馬夫。他替他的職守作辯答。他說指揮員告訴他，他這種工作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很高興的幹，雖然他實在是想在前線上工作，當我問他對於紅軍是怎樣喜愛的，他馬上從衣袋裏抽出一本記事冊，將他寫在上面兩三百個字很自負地展給我看。「我在山西活了六十四歲」他說，「從來就沒有有人費神來教我識字。我在紅軍中祇有半年，你看，我已認得這麼多了」。很可能的這些事情說明，紅軍怎樣可以在去春到山西的時候，得以補充一萬五千名新戰士。

我在紅軍中遇見一個基督教學生，我還看見一些說英語的中國人，他以前是基督教牧師。我在甯夏看見一個士兵，他以前在山西某教會醫院的藥房裏做過事。他說他現在仍是一個基督徒，每天做祈禱，從沒有人干涉他，不過「小鬼」替他取個渾名叫做「禮拜堂」。我看見他的時候，他在做剃頭的工作，他似乎因為職位的卑下而微露窘態。他掛開衣裳，指示給我他在最近戰役中所受到的兩處長傷痕。他解釋，因了傷，他所以沒有在前防，而傷痕完全愈了之後，他必重赴前線。這個人對於他以前的教會僱主非常的忠實，他說他們並沒有反對他加入紅軍，並且告訴他和他另外一個也加入紅軍的朋友，說紅軍看來也是一些好人。他將那個山西教會醫院兩位美國醫生的名字告訴我了，要我寫信給他們，通知他們，他很好並且快樂，而且一旦革命完成之後他還要回到那藥房裏去做事。我很捨不得離開「禮拜堂」。他是一個善良的人，好的理髮匠，而且是真正的基督徒。

我也在紅軍中遇見些回民，獐獐，苗族，遇見些從奴籍逃出來的青年學徒，遇見些曾做過婢女而為紅軍所解放的青年婦女。她們有些做看護，有些担任軍服縫紉，還有的做婦女團體的組織者。她們都很忙，不過她們常常唱歌。

我也遇見些二三四歲的青年，他們在紅軍中已打了十年的仗，他們的家已經完全為他們所稱為「白軍」的所毀滅了，父母，兄弟，姊妹，都被殺得一個也沒有了。我遇見著名的紅軍指揮員徐海東，以前是湖北的一個盜鑿工人，後來在鄂豫邊境充任游擊隊領袖，而該隊逐漸發展成為正式紅軍。徐告訴我他家族被國民黨軍官殺了六十六名之多，凡他那區內姓徐的都被殺了。現在他的全族祇留了他和他的一個兄弟。

看到這點，你也許要問，怎樣共產黨能真正誠心想和國民黨以及其他政黨成立聯合戰線呢？怎樣他們能够忘記十年來的戰爭和痛苦以及對於國民黨因它一九二七年的反動而應對內戰負責的憎恨呢？

好的，共產黨對南京政府的政策究竟是怎樣的呢？我想最省事祇有引一段我和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於九月二十三日在保安的談話：

我問毛澤東：請你不可以解釋共產黨的聯合戰線政策以及它對於國民黨政府態度的改變？

他答：（以下見與毛澤東談話翻稿七十頁起至七十一頁）却是，在當前，日本是盼望：與世界上一切自由的人民手攜着手地前進。」爲止）

這够明白了，說得也坦白。但是有種意見，認爲這是愚弄欺騙國民黨放棄政權的請

求。我看來這不免幼稚點，如果認爲共產黨在設想，他們可以僅拿言語來催眠南京屈服，或者認爲南京是易欺的，不一定要上這種僞善的當。我相信這些恐懼都是不必要的，因爲共產黨和國民黨雙方都在政治策略方面飽經世故，決不會將他們的信心交給魔術。

在我的意見看來，國民黨或南京政府對反對派讓與任何部份的政權是沒有絲毫的可能，除非他是在全國絕對壓力之下，同時除它非絕對非擴大其政權的基礎以求自存不可。很明顯的紅軍和蘇維埃政府祇能充迫使南京建立代議的民主政府，一部份壓力而已。除非這個要求還有大部份武裝的和非武裝的羣衆支持，它的推動是不見得會發生的。

不過最近的事實發展指示，這樣的一種壓力已被推動了。目前危機下西北的要求與紅軍和蘇維埃政府的要求相符合，而在基本的原則上是一致的：停止內戰；代議制民主政府；民權自由，釋放政治犯；反抗外力侵略。拿這個綱領與去年來在大壓迫之下仍得施其威力的救國運動的綱領相比，我們可以看到大批非武裝的羣衆也同意於這些要求。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廣西，四川，綏遠，山西，河北，山東諸省，如果危機仍沿目前的線路發展下去，也會提出他們的意見贊成停止內戰并在中國開始一個民族主義和民主建設的新時代。

西安事變根本的原因在我看來可以統括如次：

第一，厭惡十年的內戰，同時眼看見民族很快的被日本所割裂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是西北一致的呼聲，一直到現在仍如此。

第二，不滿意六年來對日本無情侵略南京的非戰政策。這些年眼見中國喪五分之一失的國土，14%的鐵道，88%未經墾殖的土地；88%的鐵礦，37%最好的森林，約40%的國家出口貿易——這些損失使許多人覺得即使南京以後好多年可能有所成就，也都補償不了。

第三，不滿意南京壓迫因對國難有所要求而興起的救國羣衆運動，西北和這種全國的羣衆運動有最密切的關係。正當日本進兵綏北的時候，不幸南京同意了日本的壓迫反日運動的要求，或許也竟執行了它的誓約。它以暴力和流氓手段壓迫了上海日紗廠中國工人的同盟罷工；這個罷工，在組織者覺得是愛國的，也是經濟性質的，正對抗着敵人在綏遠的進攻。南京同樣也順應日本要求，壓迫青島日紗廠的罷工，並在多少屈辱的協定內，應允壓迫以後在該市日人紗廠內所發生的罷工——這個事體發生於西北示威的期內。

但在這時候南京最費力的冒險或許是，很明顯的也由於日本的要求，捕捉全國聞名的上海七位愛國領袖，他們的影響是遍及全國武裝及非武裝的抗日團體的。同時一次被禁出版的有十四種風靡全國的刊物。

第四，或許比表面上看得還要深的原因，就是一般廣泛的對南京外交政策的不信任。會有人相信，南京早就接得消息知道日意德的所謂之法西大聯盟，但它沒有公開排斥反對。西北以及全國各地有人相信，南京已事實上默許以和日本締結反共公約的方式來加入這個聯盟。無論如何大批德意顧問在南京的這個事實，在這兩個實際上業已承

認東北屬於日本帝國的「滿州國」之後對於東北軍本不能容忍的。這是張學良十二日發出的通電上所提到的：「最近國際情形有驚人的變動，各國互謀以我國家及人民爲犧牲」。

南京表示決心繼續進行爲東北軍所堅持反對的內戰，一切均經佈置再來一次向西北紅軍的六次圍剿，這和日本的進攻綏遠正相適合。但一次圍剿失了滿州，再次圍剿上海被攻，三次圍剿失了熱河，再又一次圍剿失了冀東和察哈爾，所以在西北大家相信如再來一次新的圍剿綏遠必失無疑。

不過如果我們必須完全了解西北所發生的問題，並全國各地同情西北要求所發生的問題，這以上所說的僅仍是背景的一小部而已。整個的故事太複雜現在不能一口氣談完。我想冒昧試將整個的情勢簡略地解釋一下使各位稍爲清楚一點。

根本上西安這次事變實在代表中國兩個相反的勢力尖銳的分裂，這兩種勢力緊迫關連着將軍們的命運，因而比將軍們更不知重要多少，一種我們能夠看得出，是組成南京政府決定的威權的勢力，它是右派，懼怕任何羣衆運動，反對民主，反對那足以威脅它的獨裁權力尊嚴的共產黨或任何反對派的調協，如果被反對派追逐過甚，它有趨於與法西斯列強如意德聯合的傾向，有少數極端的一部份想聯合日本進攻中國紅軍再進攻蘇聯。

另外一種勢力，在對蔣總司令兵諫的後面的那種勢力，根本代表全國最極端反日的份子。他們要求立刻對日宣戰，因而擁護各黨各派各軍的聯合戰線，擁護以實行代議制民主政治擴大南京政府基礎的方法來中止內戰。他們要中國實現土地改革，政治上軍

事上組織并武裝羣衆，因爲充分武裝了的羣衆運動並沒有甚麼可怕的。

第二種勢力擁有抗日軍隊，救國團體，學生運動，以及一切反對派的進步政黨，和紅軍等的支持。它因爲是世界民主陣綫的一部份，顯明的將可以獲得英，法，美，蘇等國的支持。楊虎城會公開宣稱：「我們的運動是和全世界的民主陣綫不可分離的」。第一種勢力，由於它的積極抵禦第二種勢力，自然受着日本的支持，以及一切那些堅強反對中國擁護蘇聯擁護民主傾向的國家的支持。

從西北提給南京的八個要求看來，目前的運動屬於那一種勢力是很明顯的。這些要求我們不妨重述一下。

1.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共担救國任務；
2. 停止一切內戰；
3. 釋放上海被捕救國領袖；
4. 釋放一切政治犯；
5. 開放羣衆救國組織；
6. 保障人民集會組織的民主權利；
7. 立即實現總理遺囑（聯俄，聯共，保護農工）；
8. 召集救國會。

照我看來，凡從一九三一年密切注意中國一切事變的人們，很少會辯駁否認這些要求是代表大部份政治覺悟了的中國人民的意志。

在這種情形之下，共產黨站在甚麼地位呢？大家現都知道，他們支持抗日運動，改變了他們軍隊的名稱爲「抗日先鋒紅軍」。在宣言裏面，在廣播的演講詞裏面，西安的領袖會提及他們的四位一體的反日聯合武力，這裏所謂之四位一體就是：西北軍、東北軍、抗日紅軍，和人民的羣衆運動。即是說千萬的西北工農，現在正受着政治軍事武裝的訓練，許多的軍隊士兵成百的學生近幾月都跑往西安幹這種政治工作。

但紅軍，和其他的反日勢力一樣，是反對繼續內戰的。它主張最要緊的就是對南京施以充分的壓力，使在堅強民族主義的進步的民主勢力的基礎上實現中國的和平統一，但反對再用武力統一中國的企圖。中國共產黨中央執委會和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最近通電向南京作如次的提議：

「自從西安舉起對日抗戰的旗幟，提出八項要求，南京在鎮壓反叛的藉口下已舉行討伐。全國聽到這個消息都驚駭恐懼。雙方在糾紛中都堅持各自的立場。如我等不存偏見來評判這個爭執，我們看到西安領袖的行動是出於愛國熱忱，亟願速定國策並馬上舉行對日抗戰，同時南京方面的領袖則從事於一種迂迴遲疑因循的政策。除開親日份子之外，南京方面也不見得不願意抗日，發動內戰也不能是他們真正的目的，因爲在目前情形之下我們不抗日即不能生存。而我們民族不統一即不能抗日。」

「目前堅持舉行國內的新內戰，無異於自陷民族於毀滅。在這種危急的時候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作如下的提議：

「1. 以潼關爲分界，南京軍隊不向該城攻擊，抗日聯軍留駐陝西省境，和平等待會

議解決；

「2. 南京立即召集全國會議；代表不僅限於南京，還要包括西安，全國各地，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共產黨與蘇維埃政府也準備參加這個會議；

「3. 在這個會議中要討論的是南京西安雙方的主張以及各黨各派各軍提出的抗日救國問題。會議的基本目的是聯合全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4. 這個會議在南京舉行。」

「以上的提議是擬訂一個具體方案解決目前緊迫的危機。我們希望一切忠誠爲國的都會接收我們的意見，馬上容納這些提議以救民族。如內戰實現全國必淪於紊亂，而日寇必乘機進攻我土地，而亡國將是我們眼前的命運。」

我希望我所向各位提出的幾種理由能够解釋爲甚麼我相信目前的情勢，雖具有某幾點喜劇的外貌，實質上是挾有中國對內對外的深切問題在裏面的。這也許是一九二七年以後隨着中國的最大的危機時代。我對於這個題目當然沒有說得詳盡。我祇希望我沒有使聽衆疲倦，謝謝各位。

與毛澤東先生的談話

EGAR SNOW

小引

一九三六年七月初，我到了中國西北蘇維埃區域內以便與中國共產黨領袖談話，同時親自觀察蘇維埃政府和紅軍所樹立的那種制度。蘇維埃區域當時包括陝北之大部和實際上整個西安蘭州公路以北黃河以東之甘肅境域（即甘北），和長城以南黃河以東之甯夏大部領土。同時在陝南，甘南，山西極西北角，江西，福建，貴州，四川，亦仍有小的紅色遊擊隊伍。

現在紅軍所佔領的整塊的蘇維埃區域，其幅員之廣大為從來所未曾有。紅軍各軍之高級指揮長官如朱德，彭德懷，蕭克，羅炳輝，張國燾，徐向前，徐海東，賀龍，林彪，陳昌浩，毛澤東，周恩來等，均集中於一個統一的區域，即中國的西北境。這是紅軍有史以來的創舉。

我在蘇維埃區域住了近四個月。在這期間內，曾跋涉於陝，甘，甯夏的蘇維埃區道上，曾與紅軍在前線上度了一個月。在陝北臨時京都保安，我曾與蘇維埃大部份領袖會談。我與中國中央蘇維埃政府主席和紅軍指揮毛澤東之談話，通常是在夜間舉行的，常常延展到翌日早晨一兩點鐘。毛氏就寢時極晚，他底最繁重的工作多是在天黑到夜半的時間內做的。這個習慣可以說是他早年當新聞記者時遺留下來的。我們的談話過長而且牽涉極廣，所以不能完全在此地發表。此地祇選出彼此問答的若干部份，這對於目前中

國以及世界時局的發展似乎是有特別興趣的。

關於蘇維埃政策的正式談話，是由一位保安蘇維埃青年工作人員，伍良賓（譯音）先生擔任翻譯，我完全用英文將毛先生答覆我的各問題寫下，然後再翻成中文，請毛先生校閱，毛先生是素以小處都要精細聞名的。因這樣的仔細，我相信下面所發表的，不見得有很多報告上的錯誤。

有趣味值得說明的就是，助我收集關於蘇區的材料，我非常感激的伍良賓先生，原是蔣介石將軍的故鄉浙江奉化的大地主之一的兒子，幾年前他的父親，明顯的懷着奢望，想將他和總司令的戚眷聯姻，但他是從故鄉逃跑了。伍曾畢業上海大夏大學，隨後并留學法，英，俄三國。他現在廿六歲，目前做了共產黨黨員，努力工作所能獲得的，除制服，房間，以及以小米和麵條爲主品的食物外，別無其他。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在中國陝北保安與毛澤東關於外交談話

我問：蘇維埃政府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一般的政策是怎樣的？

毛答：在討論政策問題的時候，我必須請你經常記着，今日中國人民當前基本的問題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我們的蘇維埃外交政策是斷然受着這個鬥爭所影響的。日本軍閥希望征服全中國并將中國人民造成他們的殖民地奴隸。反對日本進攻的鬥爭，反對日本經濟軍事佔領的鬥爭，這些是分析蘇維埃政策必須記着的主要任務。

日本侵略正威脅中國，也同時威脅世界和平，尤其太平洋和平。日本帝國主義

者不僅是中國的敵人，而且是全世界凡企望和平的人民的敵人，它尤其是從太平洋利益有關的諸民族，如英，美，法，蘇聯等的敵人。日本的大陸政策以及海軍政策的執行都是不僅危害中國而且也是危害這些國家的。

因此，日本侵略的問題不僅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一切與太平洋有關的民族應解決的問題。所以中國蘇維埃和中國人民要聯合一切民族，人民，政黨，羣衆團體，與他們建立聯合戰線反抗日本帝國主義。

甚麼是我們所希望於列強的啊？我們希望至少友邦不會幫助日本帝國主義，但採取中立地位。我們自然更希望他們會積極地幫助中國去抵禦日本的進攻和佔領。

我問：蘇維埃政府對於友邦和帝國主義國家是怎樣區別的啊？

毛答：關於一般帝國主義問題，我們看到，在列強之中，有些表示不願從事新的世界戰爭，有些不想看到日本佔領中國，這些國家如英，美，法，荷，比都是。還有經常在侵略列強威脅之下的國家，弱小民族，屬地，殖民地，半殖民地等等，如暹羅，菲律賓，中美諸國，加拿大，印度，澳洲，荷屬印度等，這些多少是在日本威脅之下的。我們認他們爲友并要求和他們合作。至於蘇聯，這種採取和平政策，不願征服剝削任何其他民族的國家，自然一定是我們的好友。

因此除日本以及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諸國家之外，上述的各類（反戰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社會主義的）都能組織起來，成爲反侵略，反戰爭，反法西的

世界聯盟。

上述各類民族之任一，它想加入這個共同陣線，我們總把它做友邦歡迎，不管它所能起這個共同陣線成爲反抗侵略者的有效武器的服務程度是怎樣的。

過去南京從英美及其他國家受了許多幫助。此中大部份的經費與物品都用在內戰。這種戰爭不僅對付紅軍，並且是對付全中國人民。南京在能殺死一個紅軍士兵之前不知已屠殺了若干工人農民。根據銀行家章乃器氏最近的一篇文章，南京殺死一名紅軍士兵所費的中國人民的金錢是八萬元。因此這種「幫助」在我們看來對中國人民絕沒有好處。

祇有南京堅決抗日的時候，并與人民的革命聯合起來組織民主的全國國防政府，祇有那時候，這種幫助才能真正對中華民族有福利。在那時候這種幫助可以用兩種方法實現：1. 將信用，貸款，軍火，或飛機，供給中國的抗日的武力；或者，2. 在真正的抗日鬥爭起始的時候，建立對日本的封鎖如果英美能這樣幫助，中英，中美人民之間必會樹立起來極鞏固的同情聯繫。

我問：蘇維埃政府是否要認承北京及南京政府所訂的對外條約？如果的話，那幾個條約它將承認？

毛答：事實上日本人正在毀壞這些條約，用軍事佔領滿洲，在華北走私，和其他非法行動，這些條約在事實方面已漸次被摧毀了，我們特別可以看到，在滿洲境內其他列強條約地位的崩潰，普通商業及對外貿易都被日本從中破壞。因此設或其他國

家希望繼續與中國保持和平的商業關係，他們必須制止日本，因為目前仍留給他們的這種貿易權利已根本爲日本所威脅了。

別的國家的政府也許問我們「對於以前中國政府與我們訂的條約，你們將取怎樣的態度呢？」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的答覆是很清楚的。現在甚麼是更緊要些，修改條約？還是救國？很明顯的，我們更重要的工作是抵抗日本，因此蘇維埃政府與中國人民將要集中全力於這個任務。

也許人們還要問：「設或蘇維埃政府勝利地擊潰了日本，恢復了中國的失地，重建了中國的主權，它對於治外法權這類的問題將取怎樣的態度呢？」

對於這點我們的回答就是，到了那時候，設或有了一個中國人民政府，而蘇維埃僅是它的一部份，我們必主張根據在戰爭中各列強所表現的，來定我們的對外政策。凡在中國前獨立解放戰爭中，幫助了中國，或者沒有反對中國的諸列強，中國必將延請他們享受與中國的密切友誼和互利。那些積極幫助了日本的國家，自然不應當獲得同樣待遇，比方德國，它已經和滿洲國建立了特殊關係（最近並與日本締結了同盟 E.S.註），就不能認爲是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友善的國家，

到了中國真正獲得獨立的時候，在中國合法的外國貿易利益，一定更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享受多些的機會。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生產力和消費力決不會僅是中國人的利益，必定還要照顧其他國家。我們的羣衆，一旦真的解放了，挾着其潛

伏的生產可能性在各個園地內作自由創造活動，定能幫助改進經濟，也能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準。但在過去中國人民的生產力差不多沒有被觸及並且恰恰相反，遭受着本地軍閥及外國帝國主義，尤其日本帝國主義的抑壓。

到了中國獲着獨立的時候，我們必和友善的國家談判互相幫忙，互相關切，互相同意的條約，但對於日本我們現在祇有一個辦法，就是武力抵抗，不過對於其他的國家，中國準備在比目前更廣大的規模內，保持合作，並在互相尊敬互保威嚴的基礎上建立那種初創的關係。至於對於日本，中國必須舉行解放戰爭，廢除所有的不平等條約，沒收一切日帝國主義的產業，並且取消日本所有在中國享受的特權，租借地，政治勢力等等。這包括何梅協定，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任何反共公約，等類的「條約」這些都是全體中國人民所反對的。

關於我們和其他列強的關係，我們共產黨，不主張任何足以使中國抗日鬥爭在世界地位上處於不利的辦法。

我問：你們的政府是不是會承認外人在中國的財產權利；比方，它是不是會承認目前的外國在華投資？如果不是全體都承認，那一類的外國投資可以獲得承認，並且在怎樣的情況下外國商人能在中國活動。

毛答：蘇維埃政府歡迎外國資本的投資，在過去中國沒有能夠利用外資替中國人民造真正的福利。外國資本對於羣衆造福很少，甚至於完全沒有造福，祇有中國達到真正的獨立和民主，它才可能享受外來的大量資本，作為大規模生產企業發展之

用。同時也祇有自由的中國，因着生產的經濟廣泛的發展，才有能力償還這種外國投資的本利。

合法的對外借款是要承認的。我們必定承認一切情來并用來作建設工作的借款爲合法，我們決不承認任何「政治借款」以及利用來作內戰，作進攻紅軍以及作其他用途與全體中國人民利益無關的借款。我們必定承認用來建設鐵道，電信，無線電，航空，工業農業發展，救濟飢荒，等等的借款。

我問：關於（1）外人政治權利，以及（2）外人投資，蘇維埃的政策與國民黨的政策是怎樣根本不同的呢？

毛答：國民黨利用了外資，主要地從事於軍閥內戰，進攻紅軍，或者耗費於別種愚蠢的行動，同時所有它的借款都引起中國主權更進一步的損失。設或一個人民政府建立起來了，外人借款及投資祇應用來作發展中國經濟生活基本生產能力的任務之用——尤其在建立基本工業以及在全國範圍內介紹科學的農業方法和組織。與南京的政策相反，沒有一種外人投資，足以影響中國的獨立政治權利的，是應當被承認的。

我問：是不是蘇維埃的新政策要承認外國傳教士的財產權利？是不是他們繼續有權利傳教，教書，掌管土地，辦理學校并進行其他企業呢？

毛答：是的。不過日本的傳教士不在內。

我問：目前蘇維埃政府對於美國政府以及美國人民希望些甚麼？他們二者怎樣才可以盡

他們對中國人民的幫助？

毛答：在我們的意見看來，美國人民以及美國政府都對中國保持了遠大的眼光，同時環境註定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及日本的將來也要發生很活躍的作用。我們希望并且相信，他們會繼續眼光遠大，同時他們也會與中國人民成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以及反對以日本代表的法西的聯合戰線。這樣他們才能盡他們的所能幫助目前的中国。許多美國人民，已經將他們自己組織起來了，如中國人民之友社，太平洋關係會，泛太平洋會，中國會等，都對中國表示了好意，并且對中國人民宣露了他們真實的同情。我們以中國人民的名義，尤應感謝中國人民之友社的慷慨扶助與支持。

但是也有眼光淺薄的美國政治家，他們以為中国的被征服與他們毫不相干，我們共產黨相信這是錯誤的觀念，不了解美國利益在遠東應切實聯繫在抗日爭鬥方面的真實情狀。這些人們主張一種孤立政策。不過歷史本身顯示得更清楚了，我們希望這種「孤立派」政策會被廢除，而美國醒悟到它在太平洋方面的真實責任，是在於抵抗對於美國的理想和利益直接威脅的日本帝國主義。

我問：目前蘇維埃政府對於美國政府以及英國人民希望些甚麼？他們二者怎樣才可以盡他們對中國人民的幫助？

毛答：我們對英國人民的態度十分和我們對美國人民的態度相同。我們尊敬並且歡迎在英倫那些真正同情中國羣衆的朋友，很明顯的，一部份英國政治家在過去採用了

一種錯誤的政策。英國政府所行的政策，雖沒有真正鼓勵日本佔據中國領土，但在效果上是使日本佔據中國領土成爲可能。英國政府現在似乎想採用新的策略，但似乎又沒有充分的勇氣將之施行於東亞。設或英國繼續動搖，仍執行過去一樣的呆板政策，設或它繼續向日本求「合作」，這對於英國絕沒有任何好處。日本帝國主義的面目講也認識得清楚的。對於英國這并不是友善的面目而是毀滅的表象。

我問：在蘇維埃政府對外的政策中，關於少數民族如蒙、回、纏回、苗、裸裸、蠻、黎、藏，以及其他土人的自治權和自治制度有些甚麼規定。

毛答：關於這點，我們的政策恰恰和國民黨施行的政策相反。南京的原則是大漢主義。我們的政策是絕不含糊的民族自決。少數民族可以由於他們的自願與漢族聯合去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但是對於他們絕不用武力。我們不變更地反對大漢主義，正如我們不變更地反對藏在大亞細亞主義招牌之下的大日本主義一樣。這個政策不管對回、蒙、纏回、藏、裸裸、苗、黎，和別的中國少數民族都是一律。

在甘肅，甯夏的回人，已經在組織他們自己的自治政府。蘇維埃政府不僅不干涉他們的這種合法的民族向上心，並且恰恰相反，深深地鼓勵他們。這正和南京所施行的政策處於相反的方向，南京的政策是征服少數民族的人民，使之處於它的獨裁之下。

我們同意孫中山先生宣示的少數民族政策，這種政策在蘇聯已經勝利地被確立

了。我們反對日本對朝鮮人，滿州人，台灣人，中國人，蒙古人的政策，以及國民黨對蒙古人，西藏人，回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政策。關於少數民族問題，日本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的政策是沒有區別的。

在蘇維埃政府之下，這些少數民族都可以享受他們自己獨立的文化，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並可以獲得每一個機會實現一種生產的有益的生活。他們一點也不受中國紅軍的壓迫。

我問：許多人，因着法西的宣傳，相信中國如果完全蘇維埃化了，蘇維埃中國必不免為蘇聯所操縱，同時它的對外對內政策也會置於「莫斯科的支配」之下。許多看來有智識的人士都相信這種德意，日本，和南京宣傳的說法。這些人似乎相信中國紅軍打了十年的戰，不過是要將中國送給蘇聯，成爲「赤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毛答：誰都知道法西宣傳所含的真理，少得連任何肉眼都察覺不出來。當莫索利尼想征服阿比西利亞的時候，他的聲明是從事解放歐洲奴隸，當希特勒開始在歐洲進行侵略的時候，他告訴德國人，榮譽比麵包還好些；他告訴歐洲人，他是酷愛和平的人。日本軍閥在征佔滿州的時候，也一樣說，他們是在解放中國人民，替中國人民建立樂土。同時西班牙法西斯人們雇用摩洛哥，意，德，的僱傭兵，屠殺他們自己的人們，毀滅自己的城市，破壞自己全民選舉的政府，但在成千成萬的新屍上面標着「這是爲愛國主義而被殺的」。

同時現在，如你所說的，法西人們又在高喊「中國被莫斯科支配了」。設或這一切都是真的，那連修一條鐵路到火星向 H.G. WELLS 先生買一張車票也都會是可能的事了。

雖然法西的宣傳愚笨，仍有少數人被它欺騙，因此指出它根本的欺騙是必要的；現在，因為中國想和蘇聯締結公約，所以法西在宣傳蘇聯打算「收買」中國。如果是如此，豈不法國，以及別的幾個歐洲國家凡和蘇聯訂了公約的，都已成了莫斯科的殖民地了嗎？

法西人們不能回答有個問題：「莫斯科的莫斯科在那裏」？在他們的宣傳裏，每個國家如果看去可以有一個勝利的革命，都是受了「莫斯科的支配」。但是俄國革命是在誰的支配之下呢？莫斯科的莫斯科是誰的莫斯科呢？俄國人民在革命之後是自己統治自己，為甚麼中國人不能呢？設或法西的邏輯是正確的，則歷史一定錯了。每個有着了勝利的革命的國家一定要有一個它自己的「莫斯科」。

事實是這樣的，在這個邏輯之中，法西人們把他們自己想建立世界帝國的願望表白出來了，如日本在滿洲華北的行動，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行動等等。除開人吃人之外，他們想像不出人與人之間的別種接觸原則。希特勒在歐洲某幾部份的行動，日本在東亞的行動，意大利在非洲及西班牙的行動，凡這一類的一切行動，我們都可以說，每個都不僅有「法西支配」的威脅，並且有「法西支配」的必然性，但在世界上無論什麼地方我們卻看不見「莫斯科支配」的任何現象。

但是，最後，歷史的發展必完全相反。中國革命勝利之後，中國人民必可以歡呼俄國的人民做真正的兄弟，如同他們能够歡呼其他國家自由的人民做他們真正的平等人物一樣。不僅對於蘇聯，凡其他國家能以平等待我的，中國的人民政府都要和他們共享友好關係，並且和他們聯合起來，反對希望停止歷史前進的法西國家。

現在日本人高喊高叫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都是共產黨。但是一切中國人民，除開了少數漢奸，都是不能更改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因此在中國人民的意見，如果共產主義就是反日抗戰，如果共產主義就是民族解放鬥爭，則中國大多數人民並不害怕共產主義，同時「赤色威脅」也僅祇存在於漢奸們的夢魘之中。恰相反，這種共產主義，如米之於飢民一樣，正是全民族所迫切需要的。

設或你認為共產主義是對中國人民的「威脅」，請你問一問任何一位日本的將軍的意見。他會告訴你，共產主義在中國就等於民族解放運動，自由，民族的主權，所以正因如此，他要求南京訂立公約去反對它。但如果共產主義的意義是那樣的，則中國人正需要它。中國人民並不害怕那種運動，因為那正是他們所要求的。他們會要高呼，中國人民解放萬歲！自由統一主權完整的中國萬歲！

史達林和一位美國新聞記者談話中說過：「革命不能輸出」，同樣真實的，革命也不能輸入，這是極自然的，中國人民為要活命應當要求採用最善的反日方法。

我們在共產國際的決定案內，以及在蘇聯的憲法內，尋不出任何蘇維埃中國應歸蘇聯統治的規定。這種事情自然從來在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期內沒有討論過。但是我們不要看遠了，祇要看到我們鄰邦法西日本，就可尋到每種以法西統治中國的具體計劃。

從歷史的事實我們知道，蘇聯以完全平等誠摯的精神幫助一切被壓迫的民族。我們知道它並不企圖從任何國家獲得一寸土地或一個人口。

我問：中國人民蘇維埃政府主張與其他國家成立反帝反法西聯盟。是不是中國有可能與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列強成立這樣的聯盟呢？

毛答：反法西聯盟在性質上是和平聯盟，並且互相防衛反抗製造戰爭的國家。如果中國與蘇聯訂立一個公約，這一定因為法西日本是蘇聯的敵人，同時也是中國的敵人，「互助防衛和平」是現行法蘇公約的根本基礎。這種基礎也可以供各太平洋國家縮結類似的反日公約。

中國不僅可能而且願意和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訂立反法西公約。加入反法西陣綫以求自衛，是對於這些國家有利的。

這些列強當前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完全被殖民地化呢？還是抵抗侵略者變成一個自主國家呢？如果中國成爲自主的國家，外國在中國的合作機會必定會更加增加擴大，因爲中國會得自由，而中國人民會成爲獨立民族，並獲得獨立的經濟，文化，政治，組織。這樣的一個中國必能成爲世界上擁護福利的偉大力量，

并且是公平和世界文化發揚方面的同盟者，這樣一個中國的勢力，別的民族決不會輕加鄙視的。

但是，設或中國被完全殖民地化了，太平洋的將來誠然是黑暗的。這不僅是中國獨立的毀滅，而且也是太平洋沿岸一切民族，一切文化趨於毀滅的威脅，并且也是長期可怕的無意義的戰爭的開始。

現在一定要選擇。爲自己本身中華民族將採取反對侵略者的鬥爭這條路。同時我們希望外國的政治家和人民也將和我們在這條路上一同前進，但不要隨着帝國主義血腥歷史所設下的黑暗道路走。

因此在這個基礎上你聽到蘇維埃中國人民的呼聲：「各國人民聯合起來！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與壓迫！」

同時我們相信，這個聯合也許在事實上會實現，因爲我們想不到爲甚麼沒有好的理由，向一切向太平洋誠懇要求和平互利的文明人們作呼籲。

七月十六日在保安與毛澤東先生關於日本帝國主義談話

我問：倘日本戰敗而被驅逐出中國，你是否認爲外國帝國主義的主要問題就將一般地解決了呢！

毛答：是的。如果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不步日本後塵，如果中國戰敗日本，這就是說中國羣衆已經覺醒，已經動員起來和已經建立了自己的獨立。那麼，帝國主義之主要問題是將會被解決了的。

我問：中國蘇維埃政府曾發出了許多呼籲和宣言，號召一切黨派，軍隊等等組成聯合戰線，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殊死戰，驅日本軍隊出中國。蘇維埃政府是否相信中國現在能夠單獨的，換言之，即沒有任何外國幫助，而能夠打敗日本呢？

毛答：讓我先提醒你，中國和日本都不是孤立的國家。遠東的和平與戰爭問題是一個世界問題。日本有牠的背後的同盟者，例如德、意（這是指日德締訂反共協定，意承認滿洲國以前的話。「背後」這個詞現在似乎是多餘的。——作者註）；所以，爲要務利地反對日本，中國也必須設法取其他列強的援助。但這並不是說，中國如無外撈便不能抗日（着重點是作者加的，下仿此——譯者）。這並不是說，我們一定要等待有了外面的聯盟然後才開始抗日。

中國貯藏着極廣大的力量，還未被利用。在一個偉大鬥爭的時期中，這個力量能夠經過組織而引導到極有力的反抗戰線中來。由一九二七年反革命者所引起之

長期內爭中，經過中國共產黨底奮鬥，中國人民已經深知這個力量，並且找到了領導這個力量的好方法。在長期的政治經驗中，中國羣衆已經學會了怎樣使用極有效的工具去反對他們的敵人。

現在，特別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後，漢奸之武斷宣傳已經破產，今日很少有人再受其欺騙。羣衆日益認識誰是爲着他們的利益而領導他們的。卽國民黨黨員亦有已經參加或願意參加反日運動的了。

我們深信，中國人民是不會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我們深信，他們將動員他們的偉大儲蓄力量來抵禦日寇於戰場之上，用盡極大的精力來對付侵犯者的挑戰。在此鬥爭中，最後的勝利：必定屬於中國。如果中國獨自作戰，則犧牲將比較大而戰爭時期將比較長，因爲日本是一個強有力而且器械精全的國家，牠並且還有牠的同盟者。爲要在最短期間和以最小的耗費來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中國首先應該在本國境內建立起聯合戰線；其次應該把這一聯合戰線開展到太平洋和平利益爲其利益的一切列強中間去。

我問：在何種條件之下中國人民能戰敗日軍和使得它精疲力盡？

毛答：有三個條件將保證我們的成功：第一，建立起全中國的反日民族聯合戰線；第二，組成世界的反日聯合戰線；第三，現在呻吟於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被壓迫民族的革命行動。這些條件當中之最中心必需條件，就是中國人民自身之聯合。

我問：你想這個戰爭要經過多久才能完結？

毛答：那要看中國人民戰線的力量，中國和日本的許多決定的因素，國際對中國援助的程度以及日本革命運動發展的速度。如果中國人民戰線堅強一致，如果這一戰線在縱橫兩方面都有效地組織起來，如果那些政府認識了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他們底利益的威脅而給予中國以相當的國際援助，如果日本國內的革命迅速到來，則戰爭將於短期間完結，而勝利將迅速地獲得。倘若這些條件沒有實現，那麼，戰爭將延長極久，但最後結果還是一樣，日本終必戰敗的，祇是犧牲將是很大，全世界將有一個痛苦的時期。中國共產黨，蘇維埃政府，紅軍和中國人民樂意於任何列強聯合來縮短這個戰爭的時間。但是，如果無人與我們聯合，我們也是下定決心去獨當重任的。（共產黨在「手續上」已與日作戰，一九三二年初，蘇維埃政府在江西已宣言向日宣戰，同時並第一次提議與南京以及任何願參加抗日的反日部隊組織聯合戰線。這個宣言在國民黨境內被禁不能發表——作者）

我問：關於這個戰爭的政治和軍事方面之發展的可能前途，你的意見如何？

毛答：此地涉及兩個問題；即各列強的政策和中國軍隊的戰略。

現在，大陸政策爲日本早已決定之政策，是人所共知。如有人尙幻想以爲再進一步地犧牲中國主權，以爲用經濟、政治或領土的妥協與退讓便能停止日本之進攻，那簡直是烏託邦的夢想。過去南京會施行了根據這個策略的錯誤政策。我們只要看一看東亞地圖就可以知道這個政策的結果了。

我們深知，不獨中國北方數省，即揚子江流域以及我們底南方各海口都已經

被列入日本大陸政策的計劃中去了。再者，日本海軍企圖封鎖中國海而佔據了菲律賓，暹羅，安南，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這也是很明顯的。戰事如果發生，日本將用以上各地爲其軍事根據地，截斷英，法，美與中國之聯繫而獨佔南太平洋之各海。這些步驟是載入日本海軍計劃戰略中而且副本會爲吾人所見過的。並且這個海上戰略是將與日本陸上戰略配合着的。

到了這個時候，中國自然將處在極困難的地位。但中國之大多數人民相信他們無疑的能夠克服這些困難。祇有中國沿海口岸的富人才是失敗主義者，他們害怕他們將要損失他們的財產。

因此，當着中國考慮到經濟問題，考慮到戰爭材料供給來源問題等等，即當日海軍封鎖，貿易中斷時，這些問題一定要由列強來答覆的。倘若列強讓日本孤立中國一如其往日孤立東三省那樣之容易，倘若各列強一如那時對日本佔東三省那樣之毫無動作，那麼日本自然就將不必大費力量。

從理想方面說，我們的軍事戰略自然應該是「內線」的戰略。那就是說，如果各列強如英，美，法，蘇抵抗日本的封鎖。他們將採用「外線」的戰略。那時中國攻擊日本帝國主義之內線，其餘各國則攻擊日本之外線，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戰爭利器會有最短期間受到包圍與毀滅的可能，是很明顯的。

許多人這種想，一旦日本佔據海岸的某些軍事地點而實行封鎖，則中國就不能繼續反日戰爭，這是胡說八道，爲反駁它，我們只要引證紅軍的歷史。在某些時

期內，國民黨軍隊在數量上超過我們十倍或廿倍，在器械方面也是較我軍爲優越。他們的經濟來源比我們多得多，而且他們得到外面的物質接濟。然而，爲什麼紅軍屢次戰勝白軍，直至今天，紅軍不獨仍然存在，而且還日見強大呢？

這是因爲，紅軍與蘇維埃政府在他們領土內的一切人民當中，創造了堅如鐵石的團結，因爲蘇維埃下的每個人民都時刻準備着爲保護他們底政府，反對壓迫者而鬥爭，因爲每個人自動地和自覺地爲本身利益爲自己相信的正義而鬥爭。

第二，在爲蘇維埃而進行的鬥爭當中，領導人民的人物均是有材幹，有魄力，有堅決意志的。他們深知他們自己立場上的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戰略底需要。紅軍之所以打了許多勝仗——在起初時，堅決的革命家手中僅僅祇有幾打槍支——正是因爲紅軍在人民中有堅固基礎，能從白軍內，人民內以及各種軍隊內吸收來了許多朋友。敵人雖在軍事上遠較我們爲優，然而在政治上他們是沒有動員的。

中國人民在反日戰爭中，在他們方面能得到之便利較之中國紅軍在反對國民黨軍隊戰爭中之便利更多。中國是一個極大的國家，除非中國的每寸領土都在侵略者的刀鋒之下，則就不能說中國是被征服了。即使日本得佔中國一大部份土地，而該土地內擁有一萬萬或甚至二萬萬的人民，然而我們仍然去失敗很遠。我們尚有偉大的力量去反對日本軍閥。而且日本軍閥在整個戰爭中又必須與重大的及經常的後方行動作鬥爭。

關於軍火方面，日人無法奪取我們內地的兵工廠。這些兵工廠足夠我們軍隊多年之使用；同時，他們不能阻止我們去由他們手中繳奪大批的軍火槍械。應用上面的方法，紅軍拿國民黨的軍械來武裝了現有的軍隊。在此九年中，國民黨軍隊是我們的「軍械運送隊」。如果全中國人民聯合抗日，那麼，利用像我們獲得軍械那樣的戰術的可能，將無限地增大起來了。

從經濟方面講，自然中國還不是統一的，但中國經濟之不平衡的發展，在與經濟高度集中和高度集合的日本作戰時，却又是有利的，例如，把上海和中國其他各地截斷，對中國之損害並不會把紐約和美國其他各部截斷之損害那樣厲害。何況日本沒有可能把全中國孤立起來。在地理上，日本仍只是海上的強國，牠無法把中國西北，西南和西方都封鎖起來的。

因此，重複一次，問題的中心點還是在於動員和統一全中國的人民，建立人民聯合戰線，像共產黨自一九三二年來就主張着的那樣。

我問：在中日戰爭中，你想日本將發生革命嗎？

毛答：日本革命不僅是一種可能，而是必然的。它不可避免地，在日軍頭幾次大敗後，就會立即發生。

我問：你想蘇聯會捲入這個戰爭內來幫助中國嗎？在什麼情形下有這種可能呢？

毛答：蘇聯自然也不是一個孤立的國家。它不能置遠東事變於不理。牠不能處於消極的地位。牠將重視日本征服整個中國，拿中國做戰略的根據地，來進攻蘇聯呢，或

是牠將幫助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者，爭得中國人民底獨立，而與俄國人民建樹友誼關係呢？我們想俄國將要選擇第二條路。

我們相信，一旦中國人民有了他自己的政府，開始抗戰而願意與蘇聯及其他友邦建樹友誼的同盟，蘇聯必會首先和我們攜手。反對日帝國主義的鬥爭是世界性的任務。蘇聯既為世界之一部份，牠和英國或美國一樣，是不能處於中立地位的。

我問：中國人民的迫切任務是否為立即恢復喪於日本之一切失地，或者祇是把日本驅逐出中國北方以及長城以內的中國領土呢？

毛答：中國之迫切任務為收復一切失地，不祇是保護我們長城以內的主權。這就是說，東北一定要收回的。但這並不包括前中國殖民地的高麗在內，不過到了我們把中國失地的獨立恢復轉來時，如果高麗人民想脫離日本帝國主義之鎖鍊，那我們一定要給予他們為獨立而作的鬥爭以熱烈的援助的。對於台灣亦然。至於內蒙，該地居民為漢人與蒙人，我們努力把日本由該地驅逐出去，並幫助內蒙建立一個自治的政權。（作者註——對隨後另外一次談話的一個問題，毛先生曾發表關於外蒙古的意見如次：

外蒙古和蘇聯的關係，在現在以及過去，都經常是根據於完全平等的原則。到中國人民革命完全勝利的時候，外蒙古共和國由於它的自願一定會自動地變成中國聯邦的一部份。回族與西藏人民也一樣的會成為加入中國聯邦的自治共

和國。)

我問：倘如中日戰爭延長甚久而日本尚未完全敗北，則共產黨政府將同意與日本媾和，承認日本在東北的統治嗎？

毛答：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人，一如中國人民，決不讓日本佔據中國一寸土地！

我問：在實際上，共產黨政府與紅軍怎樣能和國民黨軍隊合作抗日呢？即是說，在對外戰爭中，中國一切的軍隊就必須有集中的指揮，如果一個最高軍事委員會容許紅軍代表參加，則紅軍是否同意於在軍事和政治方面遵守其決議呢？

毛答：是的。只要這個軍委會真正抗日，則我們的政府將心誠地悅服遵守其決議。

我問：除非由最高軍委會之允許或命令，紅軍是否同意不把軍隊調入或去打國民黨軍隊所佔據的區域呢？

毛答：是的。自然我們不會調我們的軍隊到反日軍隊所駐紮的區域內，我們在過去也未曾做過這樣的事情。紅軍決不利用戰時的環境去從中取利。

我問：如這樣的合作，共產黨要求些什麼！

毛答：牠要求堅決的徹底的實行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此外，牠要求遵守在號召建立民主共和國與建立國防政府之宣言中的各點（即在蘇維埃政府與紅軍發出對國民黨之最近數宣言中所指出的各點——作者註）。

我問：紅軍需要多麼大的根據地，多少的外援以便進行反日戰爭呢？

毛答：紅軍既可以由小的根據地作戰，也可以由大的根據地作戰，但根據地更大，則他

自然越能動員更大更強的力量對日作戰。如果我們有三省或四省的地方，則我們可以召集比南京全部軍隊更大和更有效力之反日軍力去作戰。至於援助一層，我們極爲需要，多多益善，然而我們仍能在無外援中順利地前進，在十年來之革命鬥爭中，我們會無外助地獨自作戰。我們經常是在作戰的準備中。當我們去山西的時候，我們已準備向華北日人的陣地作戰。當時我們沒有任何外援，但恰恰相反我們受着閻錫山與蔣介石合起來的武力的反對，單說蔣總司令就集中他的十師最好的部隊攔住我們的進路。這個軍事行動成了我們前進抗日的一個大障礙。

在當時爲避免無謂的自相殘殺，避免更削弱中國的抵抗實力，我們並沒有和這些部隊交戰，自動地退回我們陝西的根據地，并試行談判停戰實現聯合戰線。從那個時期起我們已經更加緊了我們一切的抗日準備，我們已準備好了。我們相信戰爭越早點開始，中國勝利的機會就越好。同時我們已準備無論何時我們的武力與日本在華北的軍隊相遇在戰線上，就與日本打起來。

我問：怎樣才可以最好地武裝，組織和訓練人民去參加這個戰爭呢？

毛答：一定要給予人民以組織和武裝自己的權利。這種自由蔣介石在過去是沒有給與人民的。不過壓迫並沒有十分成功，比方紅軍就沒有被消滅。還有北平，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學生，不願嚴厲的壓迫，已開始組織了自己，並且在政治上便準備了自己。但學生和革命的反日羣衆尙未得到自由，不能動員起來，不能得到訓練，不能武裝起來。反之，到了羣衆得到經濟，社會與政治自由時，他們的力量將增大

百倍，而民族之真正力量將得充分表現出來。

紅軍經過自己的奮鬥，已經由軍閥手中獲得自由而成爲一個不可克服的力量。反日義勇軍由日本壓迫者手中奪得行動的自由，而同樣地武裝了自己。如果中國人民受了訓練，武裝起來，組織起來，他們一樣會成爲一個所向無敵的力量。

我問：照你的意見，在這個「解放戰爭」中，主要的戰略應該是怎樣呢？

毛答：這一戰略應該在展開的，變動的和無定的前線上機動戰。這個戰略的勝利有賴於在艱難的戰地上有高度的流動性，迅速的進攻和撤退，迅速的集中和分散。牠是一個大規模的機動戰爭，而不是一個延長戰壕，深密防線和堅固工事的簡單的對壘戰爭。我們的戰略和戰術一定要由將來戰區來決定，這就需要機動的戰爭。

但是，這並不是說就可以放棄在對壘戰爭中能夠防守越久越使到戰爭有利的重要戰略地點。但戰略的軸心應該是機動戰爭，多多置重於遊擊與別動隊戰術。堡壘戰術必須利用，但牠是附屬的，在戰略上最是次要的。

在地理上戰區是極其廣大的，所以我們可以用高度效率從事流動戰爭。這對於受着兇烈的後方行動所威脅而不敢放胆前進的日本之移動遲慢戰爭機構是可奏效的。深壕集合，竭力保護狹小前線上之一個或兩個重要地位，是等於拋棄我們地理和經濟組織之一切戰略上的優越性，而陷入亞比西尼亞人的覆轍。我們的戰略和戰術一定要避免戰爭開始前幾階段上大的決戰，而應該逐漸破壞敵軍的軍心，

戰鬥精神和人力的軍事效能。

亞比西尼亞人之錯誤，除他們內部政治弱點以外，就是他們企圖保持深的前線，致法西斯得以技術較強之軍事利器來轟炸，放毒氣和打擊那些沈重的，不流動的和容易受到嚴重機體損傷的集合。

在中國正式軍隊外，我們應該在農民中組織，指揮和從政治上軍事上去準備大批的別動隊和遊擊隊。東北反日義勇軍這種隊伍所成就的還不過祇是一種小規模的例子，證明全中國農民所能動員的潛伏的抵抗力量。如果給予以適當的領導和組織，這些隊伍可使日人在每日二十四小時內忙於應付，受累至死。

要記得，這一戰爭是將在中國進行的。這就是說，日人將四面受着敵愾同仇的中國人民所包圍，日人將不得不把他們的一切軍需運入中國而保護之，在一切交通線上駐兵，用重兵保衛他們在東北和日本之根據地。

戰爭的過程將給予中國以可能去俘虜許多日本的兵士和繳獲日本的槍械，軍火，利器等。到了一個時候，在戰爭的進展過程中，反日軍隊的軍械供給將大大改良，而且將得到重要外援的補充，那時候我們漸可以利用堡壘，戰壕等等來和日軍作對壘戰爭。長期的和費用浩大的佔據中國，會使日本經濟崩潰，而且無數的，但是沒有決定意義的交綏，會使日本疲於奔命，以至軍心渙散。但在日本帝國主義如浪潮般的進攻，被中國如海礁般的抵抗衝破以後，中國人民之偉大的人力淵藪尙將湧送大批人民到我們的前線來，願意爲着他們自己底自由而作戰。

這些以及其他的因素將決定戰爭，使我們得以最後攻破日本堡壘和戰略上的根據地而驅逐佔領中國土地的日軍出中國。

被我們俘虜和繳械的日本軍官和士兵，我們將歡迎他們，優待他們。我們不殺害他們。我們將如兄弟般地對待他們。和我們並無仇怨的日本無產階級兵士，我們將用盡一切方法使他們起來反對他們自己的法西斯壓迫者。我們的口號是：「聯合一致去反對共同的壓迫者，法西斯首領。」那些反法西斯的日軍是我們的盟友，他們與我們的目的並無衝突。

七月十八日在保安與毛先生關於國內問題談話

我問：對於（一）民族小資本家，小資產階級（二）大資產階級，地主，買辦（三）智識份子或自由職業者——醫師，工程師，記者，建築師等，蘇維埃政府目前的政策是怎樣的呢？

毛答：在目前形勢之下，全中國人民都有立刻成爲日本奴隸的危險，我們的政策在許多方面已經修改了，使一切愛國份子都能在民族反日戰線之下聯合起來。

不僅現在，即從蘇維埃政府開始的時候起，我們經常歡迎智識份子參加，一切職業界人們都享有蘇維埃公民權利。小資產階級小商人等也獲得政治權利。凡家庭是資本家或地主的，祇要他本人參加革命，也享受蘇維埃公民一切權利，也能當選充政府人員。

我們不僅歡迎智識份子，我們并致勸他們參加我們，我們保證幫助他們在蘇區獲得有用的快樂生活，我們能夥立刻給他們職業以及適當的生計。

在現在準備抗日戰爭的時期中，我們迫切主張充分保障一切對民族運動能有貢獻的實業。紅軍無論在何處要保護人民的愛國活動以及工商業。這可以從陝西各城市牆壁上招貼的我們的佈告和通令上得到證明。

在現在的時期內，富農的土地不沒收。但地主的土地必須重分，因爲不實行土地革命將阻礙抗日戰爭根據地的鞏固，不沒收沒收土地的地主也能獲得供他們自己耕種的一份土地。小地主的產業不沒收。地主參加抗日運動的能給予特別的考

慮。白軍軍官參加抗日戰爭的可以分得土地，家族受保護。

蘇維埃的法律特別有一條規定保護海外華僑。這些華僑都是愛國的，在許多國家他們也是在壓迫之下，因此我們將盡可能的保衛他們的地位和權利。

我們的政策的目的是加速聯合一切人民抗日，并經過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戰爭獲得民族解放。

我們已經廢除了國民黨征收的一切稅捐。在陝甘我們目前並不征收土地稅，將來我們也祇征收一種很低的累進稅。

我問：是不是這一類改變的某幾項難免令人感到你們在拿廢除共產主義做你們目標呢？

毛答：不，我不是那樣想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將是世界革命勝利的一部份，因為在中國將帝國主義擊潰了就等於毀滅了帝國主義最強有力的根據地之一。倘若中國獲得獨立，世界革命也會進展得很快。

倘若中國被敵人征服了，我們將喪失一切我們所有的。沒有民族自由的人民，他們的革命任務並不是立刻實行社會主義，而是爲獨立而鬥爭。倘若我們被盜去了實行共產主義的國土，則我們連討論共產主義都不可能了。

反抗日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專由一個階級參加，也不能專在單一的戰綫上舉行，否認這點就等於否認許多有錢的人都已參加抗日運動這個事實，因為日帝國主義正在利用貧的摧毀富的。有些資本家，少數銀行家，甚至於有些地主，還有許多國民黨軍隊的軍官，已經表示準備爲民族解放而鬥爭。我們不能否認他們在

這個鬥爭中的作用。甚至於蔣介石一旦決定加入抗日作戰，我們也歡迎他參加。你知道，我們累次寫信傳信給他，證明我們關於這點的誠懇，并答應祇要某天他願意抗日，我們的武力可以由他指揮。

我問：對於這些提議是不是已經有了甚麼答覆呢？

毛答：到今日止，蔣總司令仍沒有答覆。但是我們照樣繼續要求，并且可望他終於接受。南京的軍隊目前又在前進攻擊我們。在另一方面我們還是要回答這些攻擊；我們迫不得已要以防禦戰爭回答那些想毀滅我們的人們。同時我們繼續向南京迫請合作。我們的口號是「停止內戰聯合抗日！」

反對繼續內戰的運動在全國正在增漲，並且更多的國民黨軍官會要加入這個聯合戰線，直到蔣介石也被迫改變他的策略。其實我們紅軍有一些有力的領袖，原先都是國民黨的軍官和官吏，比方，朱德，羅炳輝，賀龍，彭德懷，林彪，陳庚，葉劍英，徐向前，僅祇提這幾個人就都是國民黨的軍官出身。林伯渠會做過國民黨的財政部長。像這些已經加入了一樣，隨着反對日帝國主義的鬥爭加緊，許多別的也會加入紅軍。

（最近西安事變，在西北由張學良統率的東北軍扣留蔣介石，并提出八項要求，就是明顯的表演。這些要求差不多正和本談話所舉出的聯合戰線國防政府的主張相符合——作者）

七月十九日在保安繼續談話。

我問：中國以及外國報紙登載了許多關於紅軍的「野蠻」及「殘酷」的消息。或許這些攻擊文字是南京上海以及別的國家從沒有看見過一個紅色戰士的紳士們所寫的，但仍有一些人相信這些故事，正和許多人在美國柏相赫斯脫（美國雜誌報紙大主——譯者）麥克菲登（美國黃色記者——譯者）宣傳蘇聯的所謂之「饑荒」、「屠殺嬰兒」、「共妻」等等一樣。實際上蘇維埃法律的眼光中，那一類人才犯着該處死刑的罪呢？

毛答：以前蔣介石和國民黨傳播了許多關於紅軍在蘇區殺人放火奸淫的虛構故事。最近這一類的宣傳比較少了，也許今日祇有少數人才能被這種粗淺的說謊所欺騙。我們請你自己去參觀，看是不是專有以殺人放火為樂事的人。我們的人們另有他們遊戲的方法——賽跑，跳高，跳遠，玩網球，籃球，并幫助農民種田。你也不會聽見一件紅色士兵犯奸淫的案子。紅軍對於這種犯罪是要處死刑的。

現在多數的人民知道，蔣介石一致的策略是毀滅整個從紅軍手裏收回的區域，并燒掉從紅軍手中收回的村莊。這是事實，祇有以屠殺蘇維埃化了的區域的羣衆為手段，——因為羣衆是紅軍唯一真正的基礎——國民黨才能重新將那些區域置於它的統治之下。

紅軍從不燒毀一所房屋也不殺任何無辜的人民。祇有對危害民族安全的那些人，危害革命的那些人，以及罪犯之尤者，如效忠日本的漢奸走狗和反革命的積極領袖，才施行嚴厲的處分。即對付這類人，蘇維埃也是分別處理。他們犯罪

的刑罰分爲感化教育，公衆勞動，扣留，徒刑以至死刑，至於小錯誤的罪犯，在簡短審問，討論，感化拘留之後即行釋放。蘇維埃刑法是以整個社會的利益爲基礎。

四個月以前紅軍俘虜了馬鴻逵部下的一個旅長和一千五百名士兵，在繳械之後，紅軍即給予他們自由，願回白區的每名給予旅費。在出征山西的時間，我們俘虜了許多閻錫山部下的白軍軍官和士兵，也以同樣的辦法待遇他們。多數士兵留在我們這裏，以前閻部的一個少將目下在我們的教育部任職。在過去我們和蔣介石的累次戰爭中，我們俘虜了他的軍隊不下三十萬人。除開三四個高級軍官，實在是他們的壓迫和殘酷爲人民所深恨（比方，張耀讓騎軍），我們並沒有殺掉一個人。他們有兩條路可以選擇，加入我們服從蘇維埃法律；或回到白區去。這個事實是現在國民黨的軍隊所週知的，不管白區報紙是怎樣在那裏被迫橫造謊話。

有些宣傳文字說紅軍殺戮智識階級。這尤其是一種愚蠢的謊話。我們一定要智識份子，而且使用一切方法爭取他們到革命這方面來。我們的使命是解放智識階級而不是毀滅他們。請你但看看蘇區的學校教員，技師，工程師，和作家，并問問他們紅軍殺戮智識份子是否是真的。

還有人說我們殺地主。你自己可能證明我們殺多少地主。蘇維埃的政策并不要取任何不參加反革命的地主的命。大小地主服從蘇維埃法律安分勞動不從事改革

命的，很容易住在蘇區之內不受蘇維埃壓迫。

蘇維埃法律的訓練是改正罪犯的舉動，和教育他們改造他們，但並不是毀滅他們。這和國民黨的待遇罪犯恰恰相反。

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法律規定兩種法庭。一種是司法制度的，法官陪審官都由地方蘇維埃選舉，犯人可以向法官及陪審官上訴，並與法官討論對他的判決。他也可以由村蘇維埃上訴縣蘇維埃，省蘇維埃以至蘇維埃最高法院。他也可以訴諸他自己所屬的紅軍，工會，或任何羣衆團體，請求替他向法院聲辯。

還有一種審問是在同志的法庭中舉行的。在這種法庭裏被告出現於自己的伙伴之前聽取批評或勸告。這種法庭僅祇「審問」小的過失犯人，并且除開被告接受的紀律制裁之外並不加任何刑罰。同志法庭在一切政府機關羣衆組織中都有的。

目前蘇維埃法律承認除共產黨之外中國還有其他黨派也願意進行反帝政策這一事實。這些黨派不能自由存在於國民黨境內。我們給予他們庇護。我們給予人民一切自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我們祇剝奪反革命者，民族漢奸，和壓迫人民者的這些權利。

中華人民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不容許各級官吏的腐化。任何人犯了私用公款，盜竊公產的罪都要嚴罰，罪重的處死刑。共產黨黨員犯了這類罪的刑罰比起非共產黨黨員還要加倍嚴厲。

我問：那幾種工業蘇維埃政府要馬上收爲國有或由國家統制？那幾種暫時可以容許私人佔有？

毛答：一般說來，我們目前的政策並不接收私人工業或置之於國家所有之下。不過所有日本人的工業或企業自然要馬上沒收並運用來爲人民謀福利。

我問：你是不是認爲獲得政權之後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會和蘇聯一樣以同樣的速度在同樣的路線上進展呢？

毛答：我已經重加說過我們最緊迫的問題是民族解放。目前我們的目標不能是共產主義甚至於也不能是社會主義。我們所要求所希望的是建立一個全民族人民的民主共和國，必須在這個必要的機構內進行民族獨立的鬥爭。建立全中國的蘇維埃政權以及實現社會主義自然是未來的目標。如果在民主共和國蘇維埃獲得政權，社會主義建設一定會是人民大多數的一致要求。

即令我們勝利地實現了包括全中國的一個民主共和國。我們也不能堅持馬上開始社會主義，這仍是相去很遠。在中國，社會主義實現或許不會發生得如蘇聯那樣快，因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所走的路較長並且較爲困難，我們確定的主要任務是要求爲民族獨立而鬥爭，並且繼續爲民主制度而鬥爭——自從一九二七年以來紅軍卽已經爲此而從事戰爭。

我問：是不是紅軍歡迎一切願爲革命爲反抗帝國主義而鬥爭的人們不管其階級出身都加入它的隊伍中呢？

毛答：是的，我們唯一要求的條件就是他們願為民族解放而戰鬥。

我問：對於中國許多仍待解決的問題，蘇維埃政府的對症辦法是怎樣的呢？你能不能簡略的將對下述各問題的政策告訴我呢，如：（一）缺乏耕地問題——重行分配或集體農場化？（二）饑饉與火災：（三）失業：（四）鴉片毒物：（五）高利貸：（六）官場腐化：（七）文盲：（八）奴婢：（九）娼妓：（十）軍閥制度：（十一）交通不便。這些改革是不是江西實現了呢？在目前革命階段內主要的任務是反帝鬥爭的軍事準備，是不是這些改革可能在蘇區內執行呢？

毛答：我將一點一點回答你這些問題。第一，關於土地問題，目前的問題不是集體農場化的是重行分配。革命給予農民土地，不僅他們利用土地增加生產並且能享有土地。

集體農場化是將來的事情，而必待整個民族經濟是在蘇維埃政權手中才能實現。

有些人問，爲甚麼我們不實行公社，實行土地公有？我們的回答是怎樣的，現在農民的要求是土地佔有權而不是土地公有，因此我們是適應他們的羣衆要求。重分土地使農民和整個農村經濟進展極多。農民享有了土地，他們以前沒有土地，這於他們已是大的勝利。他們沒有準備集體農場化，達到這一步驟的路；要全國範圍計劃的經濟以及教育的努力才能創立，這祇有民主的人民政府在整個中國成功了的時候才可能實現。

我問：在蘇維埃綱領中有許多事情已經爲着聯合戰線的利益而緩行了，是不是土地重分也可儘遲緩呢？

毛答：不沒收地主地產不適應農民階級主要的民主要求，對於建立民族解放勝利的革命鬥爭的廣大羣衆基礎是不能的。爲要爭取農民階級對於民族革命的支持，必需滿足他們對土地的要求。這不僅在中國是如此。法國革命的勝利也是建築在廣大的農民階級基礎上的。經濟方面說來，將農民保持在目前的被壓迫的情狀下也是愚笨。農民階級所受的剝削太重了，不能增加土地生產力，也不能發展對工商業日在擴大的市場所必備的購買力。

至於「饑饉與水災」，這久已認爲是「天禍」。事實上大多數災荒是人造的，也可能以人力防止的。蘇維埃政府用了一切努力與這種災禍搏鬥。被蘇維埃所解放的農民也有大的儲蓄力以抵抗饑荒和水災。在江西我們不僅在需要的地方建了水閘使蘇區不至於受一次重大的水災痛苦，而且我們收穫豐盛從沒有一年受過饑荒。在那裏我們祇缺少鹽，因爲蘇區不生產鹽，而且因爲南京的封鎖鹽不能輸入。不過現在的蘇區內不缺乏鹽了，我們有一些中國最好的鹽的儲藏地，尤其在鹽池區域及其附近。在我們目前所處的地位，我們不怕國民黨封鎖我們，因爲有大批好鹽的供給。其他每種我們需要的物件，我們能在我們自己的蘇區內生產。（鹽池在甯夏陝西甘肅交界處，當地的鹽在中國歷史上是很著名的。紅軍和本地

蒙古族共享有該處的鹽礦——作者）

在蘇區內沒有失業的問題。你自己去觀察，看在此地有沒有乞丐和失業者。我們有工作給每個人做。以前在江西蘇區沒有乞丐，現在在西北蘇區也沒有乞丐。每一個人能找得工作，而且我們留意使每人都在工作。大家都有土地，大家都有工做。正月間在陝北最大的城市瓦窯堡，我請們了一位被俘的東北軍的師部參謀長參與新年宴會。還有別的東北軍官也在座。我們讓這位參謀長有行動自由，他能隨便走動，因為他應許不偷逃。在席上他表示駭異爲甚麼整天在那個城內他看不見一個乞丐。他說在白區新年的這天他不要走完這條街就會被乞丐所包圍。

在江西祇有那些供給蘇區以外的企業的工人停了工，因爲國民黨的封鎖停閉了市場。不過他們並沒有失業，都轉派往別的工業部門獲得了工作。

我們對於種吸鴉片的政策是怎樣的呢？你可以向任何你看見的農民詢問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禁止種吸販買鴉片，祇有醫藥用的經過紅軍醫院才可以被允許。我們禁止生產販賣所有各種毒品，在江西蘇區，有些地方過去是著名的鴉片產地，在兩年之內我們把這種毒藥完全在蘇區之內禁絕了。我們怎樣做到的呢？不僅用強迫。我們教育農民，漸次勸他們爲同胞的好處爲他們自己土地的好處而放棄種煙。在陝西以及比較老一些的甘肅蘇區也是如此。現在陝西和甘肅的老蘇區裏面，你不能看見種或販賣鴉片的地方了。我們的禁煙不像國民黨區域內的禁煙，在那裏國民黨鴉片專利僅祇阻止別人販賣鴉片，而且用死刑來對付不遵守國民黨專利的人們。祇有讓農民了解禁煙對於他們自己的福利是必要，然後禁煙才

得成功。

魏蘭：這一定是很有力量的教育。在實行上是怎樣進行的呢？

馬席：自然吸鴉片與種鴉片是密切相連的。不嚴厲禁止種鴉片，吸鴉片的根絕是不能做到的。一個人民的政府並不依賴種煙和販煙的稅收。它不要毒害人民但要復新人民，祇有買辦地主管理的政府才利於以鴉片毀滅人民，而祇有這樣一種政府才認為鴉片專賣是有用的。因此在江西自從紅軍離開，地主回來以後，農民又被迫栽種鴉片以應付繁重的租金和捐稅，并使剩下的能够生活。同時地主以及其上的軍閥一定要督促他們栽種以便從人民榨取更多的金錢。

在蘇區高利貸以及重利盤剝者都是不能被容的。這並不是說我們禁止合理的利率的貸款。在我們目前的經濟計劃內，金銀流動借貸都是必須的，不過不許可高利貸。因以前的利息都是七分八分，所以蘇維埃法律規定利息最高不過一分，馬上便大大的利於農民階級，蘇維埃政府本身借給普通農民的款子祇要五厘息，借給貧農的款子不要息。我們陝西蘇維埃銀行今年借出了兩筆款子：一批是借給農民完全無息的春耕借款；另一批是借給小商民的低利息營業借款。

押當已完全廢除了，物質也還給了應有的物主。不過普通的商業銀錢業是允許的，在長城一帶大的商業城市安邊定邊靖邊還有很多。

在紅色的區域內盜用公款官場賄賂是嚴厲處罰的。我們關於這點的法律執行得極認真。濫費公款不正當使用公款也是嚴厲處罰的。依照蘇維埃法律腐化是一種

嚴重的刑事罪。祇有蘇維埃政府不容許官吏舞弊吞款，而且堅決遵守關於這一點的法律，甚至於南京方面也是知道的。蘇維埃政府，官吏的生活費並不高於紅軍士兵的生活費。我自己是蘇維埃政府的工作人員，我的收入比一個紅軍士兵還少些，但因為我又是紅軍的指揮員之一，所以我每月有五塊錢的津貼。

希特勒聲明他在銀行沒有存款，關於這事我們不十分相信。我們聽說，他強迫他的德國臣民買他的書「我的奮鬥」，就賺了幾百萬馬克。但是我可以請任何人查一查在任何地方的銀行裏是不是尋得出一個蘇維埃官吏的賬戶。

至於文盲問題，這對於一個想真正提高羣衆經濟文化標準的人民政府並不是一個難的任務。在所有較老的蘇區內，大多數人民都是識字的，但中國的非蘇區內大多數人民不識字的。爲甚麼如此呢？這是因爲紅軍佔了一處地方從最初一刻起就組織羣衆學校，用各種方法敦促人民改進他們自己。

在江西，在教育人民委員領導下我們的文盲消除有着驚人的成功。在每個鄉村裏它建立了以青年學生，少年共產黨員，少年先鋒隊領導的小組教人民怎樣讀書寫字。這些成百的羣衆教育學校都是由組織了的農民階級自己創立的，同時由熱心的紅色青年擔任教務，他們自動地不要薪金，將時間和精力貢獻與這種工作。祇有三四年的工夫，我們江西蘇區大多數人民都認得幾百漢字并繼續得簡單的課本，演講詞，以及我們的報紙刊物。

我們的統計在長征途中遺失了，但我向第二次全國蘇維埃大會的報告內，包括

了經過人民的羣衆運動，以及經過蘇維埃建立的正式學校制度所成就的，教育進步的整個情狀（第二次全國蘇維埃大會係於一九三四一月舉行於江西瑞金——作者）。在那個時候，較老的蘇區內，十歲到三十歲的人民之中的文盲已經完全被掃除了，而在年齡較大的人民中進步也很多。

在陝甘也建有文盲消除社。此地的文化水準以前較江西低得多，今日重大的教育任務仍隨在我們面前。但是如你所見的，我們已經在陝北的農民中開始了這工作，以前陝北的人口中有百分之三或五能識能寫。有些農村從來沒有看見過教員的，現在都建立了學校。報紙刊行在此地是第一次，書籍雜誌也是如此。現在當你行經鄉間的時候，你定能不時在貧苦農民的家裏尋得些蘇維埃出的書籍刊物，你也能午刻或夜間看見他們在小的鄉村小組裏面讀書。

爲要趕快消除此地的文盲，我們已經在實驗新文字——拉丁化中文。現在新文字已施用於我們的黨校，紅軍，紅軍學校以及「紅中日報」的特欄。我們相信拉丁化是消除文盲的一種好工具。中國方塊字太難學了，卽令最好的基本字課或簡易教育法也不能使人民獲得真正有效用够用的單字。不久之後，如果我們要創立一種新的社會文化使羣衆充分參與，我們相信，我們非完全廢除中國方塊字不可。現在我們正廣泛的施行拉丁化，同時假使我們在此地停留得三年，文盲的問題一定可得大部份的解決。

奴婢在蘇區是完全廢除了，而且將來凡紅旗所到處也會完全廢除的。凡奴婢都

是立刻要解放並送還他們各自的家裏。如果他們沒有家，他們在蘇維埃工廠裏或別的生產企業內可以得到工作。但是許多的奴婢，當紅軍到了一個新地方，都被地主連貨物金錢一起帶走了。

內政委員照拂着他們。如果他們年紀大身體強健，他們可以分得一部份土地耕種。不然的話，他們可以享得公田收穫的一份。

娼妓，和奴婢一樣，是貧民破產的產物。那些無法生活的婦女被迫出賣自己的身體以換取必需品。以前在江西蘇區的村鎮裏，娼妓都完全絕跡。祇在大城市，汀州和漳州，娼妓還存在，但僅是小問題。

少數婦女在暗中賣淫，但原來操此業的大多數都被有用的工作吸收去了。有些在廠裏做工，並有兩三個做了教員。他們大都成了好公民，因為對於他們沒有歧視，大多數人民不久都忘記他們曾經做個妓女。

軍閥制度也大部分是農村破產的產物。職業兵和僱傭兵可能容易地重新被吸收回到人民中來，倘若他們獲得土地與工作。我們用廣泛的教育宣傳方法矯正以前担任僱傭兵的反社會性習慣，在南方這些方法是很奏效的。土匪受着貧窮的壓迫也能被淘汰，倘若獲着正當的生活的機會，並少許矯正以前的習慣的教育。

比方在閩西以前好幾年有着很多小股劫掠的武裝盜匪。那些盜匪關得最兇的區域自從建立了蘇維埃，許多土匪都改變成了良善的農民工人或人民軍的戰士。蘇維埃供給了他們土地或工廠中的工作。閩西與江西蘇區經過了兩三年之後，盜匪

完全絕跡，而人民也用不着鎖閉門戶。

不過現在紅軍已經離開了那些地方，而國民黨和地主都回去了，你看土匪又重起來了。特別在福建邊界上，要用成千的僱傭軍隊來防匪，來防止人民變成匪，防止人民向他們的剝削者攻擊以奪回這些地主軍閥們又從他們手中竊去的貨物和金錢。

至於交通，大家知道很清楚，甚至於國聯技術家的報告上也說，江西的蘇維埃建設了許多人民的道路并改進了交通。我們沒有建汽車路，這對於農民是沒有用的，雖然他們必須出建路費，但我們修築了好的大車路及輪車路。

對於蘇維埃，這種建設是輕而易舉并不多費錢。我們的建路計劃并不是由少數學了工程回國想拿了鉅款幹不實際的設計的留美學生所擬定的，而是蘇維埃的農民自己所擬定的，他們知道他們需要些甚麼。因此當一個計劃定了，并接受之後，執行的就是農民自己。蘇維埃就是這樣地去動員，成千的自願者來築這些路，因為這都是人民自己的路，他們知道這些路都對於他們有實際的用處，并不像留生學的路祇供軍閥們及其姨太太們用來坐汽車而農民不能用。

在陝西我們比較還沒有建築很多的道路，因為蘇維埃的成立還不很久。但是我們的蘇維埃已經在宣傳教育羣衆促醒他們對於大車路以及改進旅行路的需要。

是不是反日戰爭會停止我們上面所說的各種建設計劃和改革呢？我們不是這樣想的。在抗日戰爭期中，於全國範圍內儘速的實現這一切不僅是可能而且是絕對

必要。人民不能被動員來進行民族防衛，除非將民族防衛對他們的利益演示給他們。對於改進人民的狀況，民族獨立戰爭在事實上是必要的。

爲甚麼我們要求戰爭？保存民族生存我們絕對需要一方面反抗日帝國主義，消滅一切漢奸，完成民族獨立，在另一方面提高人民大眾的經濟文化水準。

卽當紅軍在國內進行革命戰爭的時候，它也能立刻帶給人民巨大的利益。紅軍佔領一個地方，祇要一個月就已開始了許多改善的變動。不僅紅軍中的政治工作人員領導改造的任務，卽每個指揮員和戰鬥員也參加促醒領導農民階級。

每個紅色士兵都協助執行土地政策，執行人民經濟的各種方案，創立人民羣衆的組織等等工作。在陝西紅軍已經實現了上述一切改革的大部份，在甘肅和甯夏蘇區，這一切也已經開始。

你或許已經注意到了，紅軍的每個份子不論在戰時或非戰時都異常忙碌，在和平的時候紅軍在許多方面幫助人民。人民向紅軍提出各種問題請求幫助。他們信賴紅軍并相信紅軍的公正。他們成羣的歡迎我們。許多加入我們，許多自動地以他們一切所有的幫助我們。許多自動地幫助紅軍的給養，許多替我們採訪消息并幫助防備間諜，農民們在戰爭中投效幫助紅軍擔任嚮導，掘戰壕，燒飯，并一切搬運工作。這種羣衆與紅軍間的親密，這種人民與紅軍之不可分離，是我們戰勝白軍的基本原因之一，雖然白軍在數量上和物資資源上目前仍佔着絕對優勢。

紅軍佔得一縣的時候，便馬上開始上述的這一切改革。到了這種工作已勝利地

進行了。蘇維埃也創立了，並且工農羣衆已受了訓練能領導執行綱領的時候，軍
就才離開，進行別的新範圍內的活動。

但是整個紅軍的鬥爭在基本上是反帝鬥爭。此所以它的目前擴大成爲必要的解
放戰爭抗日戰爭是一種進步的戰爭，並且對於促進羣衆的再生和革命化是必要
的。

我問：什麼將是蘇維埃政府立即要施行的工業綱領？

毛答：戰爭工業將要置於蘇維埃統制之下。所謂戰爭工業是指一切與戰爭的舉行有直接
關係的工業，別種工業部門仍就可以留於私人管理之下——自然日帝國主義的工
業是除外的，並且馬上要由國家沒收起來。

但除國家企業之外，還要建立人民的各種合作企業，同時這種計劃是有遠大的
前途的。

不過我們必須記得中國今日的情形與俄國革命前的情形是有根本不相同的地方
。我們的革命主要的性質是民主主義的私資產階級性的，因爲中國仍是一個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

於問：在戰爭期間對於利潤的統制是如何的呢？

毛答：當戰爭開始的時候自然利潤稅的問題是必須考慮的。

在目前蘇維埃政府的關稅稅則是中國唯一沒有被帝國主義列強所操縱管理的稅
則。我們的意見是這樣的，在戰爭期中稅則應自主地被調整以適合反侵略戰爭

的需要以及滿足整個中國人民的需要和要。既有奢侈品如酒類菸草等應課以重稅。對於必需品如汽油煤油等，其輸入稅則應當非常輕微，因為中國這類物品的產量不足供給全國的要求。

我問：你對於南京的外交政策的意見是怎樣的？

毛答：每個人都知道很清楚，在蔣介石領導之下南京的政策素來就是向帝國主義妥協並在外力侵略之前退縮，因此人民對南京政府的不滿意已經在擴大。

在日帝國主義壓力之下的中國人民，透過以千計的請願，上書，示威，呼籲，已在要求南京政府，在它錯誤的政策之後，擔任起救國工作，這個要求已經存在了好幾年。甚至於在南京也有許多人開始了解他們的政策是一種投降的，自己征服自己的政策，不過現在仍祇有極少的表明指示蔣介石將軍已有了類似的覺醒。

倘若蔣介石繼續如此下去，他個人權位的危機一定會尖銳起來，並可以由此而發展成爲中國內部的大危機。他可以暫時收買這個或那個將領，他可以收買中國各地軍閥依附於他，直到中國勉強獲得某種上層的統一，不過這並不能解決他自己的根本問題，以及中國的求生存爲自由獨立民族的根本問題。

一定有一天是決定的日子到來，屆時他必須抗日，或則爲他自己的不準備做日本奴隸的部下所推翻。許多他自己部下的將領現在都非常強並且要求抗敵的政策。比方陳誠，蔣部最有能力的戰術家之一，最近曾迫請蔣總司令開始抗拒侵略者，並停止內戰。胡宗南，南京最好的將領，不久之前也對蔣說：「打紅軍是一種

無期徒刑」。這兩位都被蔣介石所斥責，但這表示在一部分有力的南京青年將領中，現正增長着一種信念，眼看着國家被宰割而內戰仍年復一年繼續下去，抱着悲痛。比方，甚至於湯恩伯最近曾力主張在內蒙抗日并與一切愛國部隊結成聯合戰線。

從他自己部下的將領，以及從反日羣衆運動方面來的，日益增大的壓力，也許仍要迫令蔣了解他的錯誤並接受人民的要求。設或他停止內戰，開始抗日，重立國共二黨聯合，我們歡迎他這種轉變，並與之赤誠合作。不過這祇有蔣介石自己才能決定。同時這種決定也不能遲延過久。

七月二十三日保安與毛先生關於特別問題談話

我問：在實際進行中，倘若中國革命勝利，是不是將以第三國際或類似的組織，來保持蘇維埃中國和蘇俄間的經濟政治關係呢？抑或會有某一類的政府的真正合併呢？

毛答：我以為這是一個純粹設擬的問題，我已經告訴過你，紅軍現在並沒有求政權的獨霸，但求聯合全國以抵抗日本帝國主義。

第三國際是世界無產階級先進份子集合各自的經驗，俾使全世界一切革命的人民獲益的組織。它既不是行政組織，而且除顧問的資格外也不是任何政權。在機構上，它和第二國際沒有多的區別，雖然在內容方面相異的地方很大。正像沒有人說，在一個以社會民主黨組成的國家是第二國際專政一樣，所以說有共產黨的國家是第三國際專政也是可笑的。

在蘇聯共產黨掌着政權，即在該國，第三國際並不執政，而且對於人民一點也沒有直接的政治權力。相類似地也可能說，雖然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員，這也決不是說蘇維埃中國是由莫斯科或共產國際所統治。我們決不是爲要將國家交給莫斯科而爲解放的中國鬥爭！

中國共產黨不過是中國的一個政黨而已，在它的勝利之中，它將必須爲整個的民族說話。它不能替俄國人民說話，也不能替第三國際統治，祇能爲着中國羣衆的利益。祇有在中國羣衆的利益與俄國羣衆的利益相吻合的地方，才可以說得它是「順從」莫斯科的「意志」。但是這種共同利益的基礎將驚人地擴大，一旦中國羣衆獲得了民主的政權而社會方面經濟方面都解放了，像他們的俄國兄弟一樣。

到了蘇維埃政府在許多國內建立了的時候，蘇維埃國際聯合的問題也許要發生，這個問題將如何解決將是非常有趣的。但在今日我不能預爲擬出一個公式，這個問題既未經事先解決也不能事先解決。在今日的世界內，各國家各民族間經濟文化的交往既日趨密切，這種聯合似乎也是極所欲望的，如果在一種自願的基礎上做到。

不過明顯的最後這點是極端重要；這樣一種世界聯合可能成功，祇要每個民族享有依照自己人民的意志加盟或退盟的盟權利，它的主權保持完整，而且一定不是由於莫斯科的「命令」。沒有一個共產黨黨員曾經相反的想過，同時「來自莫

斯科的支配」的神話也純是法西黨徒和反革命者的發明。

外蒙和蘇聯間過去以及現在的關係一直就根據於完全平等的原則上。到了中國革命成功的時候，外蒙共和國將自動的由於它的自願成爲中國聯邦的一部份。回族以及西藏人民，同樣的，也將成立自治共和國，加入中國聯邦。對少數民族不平等的待遇，如國民黨所實行的，不能在蘇維埃的綱領內佔得地位，也不能在一個民主共和國的綱領內佔得地位。

我問：請你解釋爲甚麼蘇聯可以使蘇維埃中國勝利的幫助和帝國主義過去在中國活動根本有區別。爲甚麼關於「赤色帝國主義」的罪名在你的意見看來是荒謬？

毛答：有些人說法西黨徒沒有任何創造能力。我不能完全同意這點。因爲他們確確實實創造了他們自己的產物「赤色帝國主義」這個名詞。而且這是法西頌揚的那種創造水準的完全例子。在這個名詞後面日本和中國的法西黨徒們希望征服中國。但是我們用不着在國民黨歷史以外去看這一類的宣傳是不是發生着甚麼意義。

設或果真有「赤色帝國主義」這種東西，那連南京政府本身的生命都是因它而有的。每個人知道，當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黨革命的時候，鮑羅庭和加命將軍都在幫助國民黨，共產黨也與之合作，並且共產黨領導了國民革命中許多最好的幹部。在那時候沒有國民黨員談及「赤色帝國主義」。但到了國民黨變成反革命，背叛了孫先生的主義，開始壓迫農工，並且與帝國主義妥協了之後，它的最壞的份子才創造了「赤色帝國主義」這一名詞，以這個名詞做反動宣傳的外衣，藉以

掩蓋他們對中國人民的背叛。

事實是怎樣的呢？甚至於蔣介石也不能否認，當國民黨與蘇聯和共產黨合作的時候，革命達到了高水準，帝國主義連根都在搖動，而民族解放的前途是極爲光明。孫中山先生死後，他的黨中最壞的份子開始出賣他的主義政策，國民革命運動突然開始衰落，國民黨失掉了所有它的革命內容，向帝國主義妥協，將中國最好的部份不抵抗送給了日本，並且接受了帝國主義的幫助進行長朋反對人民革命的戰爭。

僅僅十年的帝國主義的侵略之後，中國人民大衆在急遽地被淪爲奴隸，南京現在方開始了解蘇聯才是中國真正的朋友，而國民黨要與蘇聯和中國共產黨重新聯合才能抵抗帝國主義。

今日鬥爭已經尖銳到了兩個營壘間的戰爭：第一個，由日本領導，以漢奸及反動派所組成，它們和日本帝國主義合力形成所謂之反赤陣線；第二個是由中國大多數人民以及對中國革命同情的那些國家所組成，這是反日帝國主義陣線。反日陣線是根據於與蘇聯及其他同情中國獨立鬥爭的國家的合作。反赤陣線的意義是民族滅亡，反日陣線的意義是民族解放。

中國人民必須漸次把自己列於這一個陣線或其他的一個這兩個是不能調和的。

不錯，許多國民黨員現在迫於環境，或爲維持他們的自存，在重新考慮他們的政策。在過去已有那些愛國志士如宋慶齡，何香凝，陳銘樞，蔡廷楷，李濟深

，蔣光鼐，他們知道國民黨想「消滅共黨」的根本錯誤。今日李宗仁，馮玉祥，孫科，宋子文，張學良，還有其他也在改變他們的觀念并似乎願意復活他們和蘇聯的合作。

我們堅決擁護與蘇聯密切合作抗日，我們歡迎與任何要停止中國內戰，建立聯合民主的人民抗日政府，保衛民族與其人民的利益的派別合作。

我問：你怎樣解釋在極大的不平衡的情勢下紅軍的屢次勝利？什麼是它無敵的祕訣？

毛答：有三個原因。第一，紅軍是人民的軍隊，他們以一切的方法擁護它。它不能被消滅，除非先將擁護它的愛戴它的人民消滅，同時當白軍在紅色區域作戰的時候，他們不僅是與紅軍作戰，而與蘇區作戰的整個人民作戰。

第二，我們的存在多虧了共產黨正確的戰略和戰術領導。

第三，紅軍的指揮員是有才能，正確，精明，忠實，誠懇。每個紅軍指揮員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接受南京所頒佈的賄賂及獎金，發一筆財不再幹了，但至今九年的戰爭經過中，向國民黨出賣的指揮員屈指數起來並沒有幾個。

我問：在中國赤色運動勝利成功了的時候，你是不是認為革命會迅速發生於別的亞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如朝鮮，安南，菲律賓，印度等處？目前中國是不是達到世界革命的「鎖鑰」？

毛答：中國革命在世界情勢中佔着鎖鑰的要素，它的勝利是每個國家的人民，特別是殖民地的勞苦羣衆，所熱忱期待着的。當中國革命獲得了充分的威力，許多殖民地

國家的羣衆將跟着中國的前例，以獲得他們自己類似的勝利。但是我必須再着重申明，我們並不在「獲取政權」。我們要停止內戰，與國民黨及其他政黨創立人民的民主政府，并反日爭取我們的獨立。

我問：你有沒有甚麼意見，對於中國革命最後能在全中國勝利所須經歷之時間的大約長短？

毛答：中國革命的勝利自然將一切革命鬥爭所發展的客觀形勢來決定，同時這些形勢，太複雜了，現在不能預測。但是我們能夠說，這個勝利相去並不遠了，它將和中國人民抗日侵略的勝利相配合。

中國人民將採用最適合於他們的政府制度，同時這種制度我們相信是民主共和國的方式，整個的政權都在被授有選舉權的羣衆手裏。在機構上，我們相信，蘇維埃制度，從中央政權一直下至最小的鄉村都是代表體制，是最適於實現民主政治的機關，并最能爲中國羣衆的利益服務。

我問：在抗日鬥爭之後甚麼是革命最先的内部任務？

毛答：中國革命，因爲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它的基本任務是土地問題的重新調整——土地改革的實現。

參看中國今日土地分配的數字可以知道農村改革迫待進行的一班情形。在國民革命的時期中，我曾任國民黨農民委員會的書記并掌理收集遍及二十一個省各區域的計劃。

我們的研究表示驚人的不平等。整個農民人口之中約百分之七十是貧農，佃農，半佃農和僱農。約百分之二十是耕自己的土地的中農。高利貸者和地主約佔全體百分之十。在這百分之十以內還有富農以及軍閥及徵稅吏等等剝削者。

這百分之十的富農地主和高利貸者共佔有百分之七十的耕地。百分之十二至十五是在中農手裏。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佃農，半佃農，僱農僅佔有整個耕地百分之十至十五。

自然在全國不同的區域。統計方面有大的參差，這種參差有時在相臨近的縣份中都表現得很明顯。我所引用的數字，是當時許多農民委員會工作人員編制二十一省數字，我們研究所得的全中國平均數。這些數字自然從反革命以後被禁止了，同時現在又過了十年，我們仍不能從南京得到中國土地分佈情形的任何陳述。

不過這些事實解釋了很多關於紅軍的成功。革命主要的是由於兩種壓迫所引起的。帝國主義者與百分之十的地主及中國的剝削者。所以我們可以說，在我們要求民主制度，土地改革，和反帝戰爭之中，我們僅祇被全人口的百分之十所壓迫着。同時實在並沒有百分之十，或許僅約百分之五，因為沒有那樣多的中國人會變成漢奸，與日本聯在一起，在聯合「反赤公約」的計劃之下，來征服他們自己的人民。

九月二十三日，保安與毛先生關於聯合戰線談話。

我問：請你解釋一下共產黨的聯合戰線的政策及其對於國民黨政府態度的改變。

毛答：三個主要因素影響了在不久以前我們所發表的宣言裏的政策決定。（八月二十五日在保安發表的致國民黨的宣言——斯諾註）。

首先是日本的嚴重的侵略。這侵略是一天的緊張一天，像這樣可怕的威脅，那末，在這威脅之前所有中國的一切力量一定要聯合起來。除了共產黨以外，我們自然承認存在着的其他的黨和其他的勢力，而且中國的其他黨派和勢力中最有力量的是國民黨。在目前如果沒有它的合作，則我們對日抗戰的力量是不夠的。南京須參加。國民黨與共產黨是中國現在兩個主要的政治力量，假如他們仍繼續從事內戰，結果於抗日運動上是會不利的。

第二，在去年（一九三五年）的八月，共產黨曾發表宣言號召中國的一切黨派聯合一致抗日。這一主張得着民衆普遍同情的回答雖然國民黨仍繼續向我們進攻。今天中國的民衆同許多愛國的官吏都渴望這兩黨爲着救國的目的而重新聯合。他們渴望停止內戰，如果不是這樣，抗日運動就要遇着很大的障礙。

第三點就是現在在國民黨的内部有許多愛國份子，也贊成與共產黨重新聯合，因爲民族生存受到威脅，所以就是在南京政府和南京自己的軍隊裏面，也有些反日份子現在是準備着和共產黨聯合起來。

這些是目前中國局勢的主要特點。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會不得不重新考慮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彼此合作可能實現的詳細的具體的方式。事實上，在不久以前我

們和國民黨的談判中，我們已經把這一方式提出。我們所堅持的聯合的基本的一點，就是民族解放的反日原則。爲了要實現這一目的，我們堅決地相信一定要建立一個國防民主共和國，和在這一制度內的國防民主政府。這國防政府主要的任務必須是：（一）抵抗外敵侵略（二）給予民衆以民主權利；（三）加緊發展國民經濟。

這樣的綱領滿足現在民衆的願望而且得到他們一致的擁護，這也就是爲什麼蘇維埃政府同意建立這樣一個全民聯合的民主政府。

我們將贊助一個議會形勢的代議制的政府，一個抗日救國的政府，一個保護和贊助一切民衆愛國團體的政府。假使建立了這樣一個共和國，中國蘇維埃政府即將成爲該共和國的一部分。我們將要在我們的各區域內實現和中國其餘地方一樣的民主和代議制的政府。

我問：這是不是說，這一政府的法律也同樣的實行於蘇維埃區域？

毛答：是的。

我問：這是不是說，現在蘇區的法律，特別關於土地問題的法律，將要廢除呢？

毛答：倘若與南京的聯合戰線組成了，那時這問題就容易解決的。自然，他們知道，日本和中國親日份子是要激烈地反對這一綱領的。這一綱領的原則是直接地違反着他們個人的利益。但是中國的民衆是會歡迎這個綱領，而我們相信他們定會努力使牠實現的。每個人，他還有天良的話，一定感到交替的一條路就是受日本帝

國主義征服的道路，是中華民族滅亡的道路。

我們知道，有一部分的國民黨，也已經起來反對再對日本的屈服，在民衆間，在一切階級間，在士兵們，科學家們，學生們，商人們，警察，自由職業者裏面，和在我們的工農裏面，也都已經組織起了反日的愛國團體，這些團體我們要開誠佈公地和他們握手合作，我們盼望這些份子會形成一個聯合的力量來克服親日派的勢力，以及那些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引導的主義的人們。我們盼望這些份子可以幫助來恢復和再一次地實現孫中山先生在大革命時代的基本政策和它最後的遺囑，這就是：（一）聯合蘇聯及其他以平等待中國的國家；（二）聯兵；（三）擁護中國工農利益。我們盼望這些份子會幫助實現孫中山先生的遺囑並抵抗日本帝國主義。

假使這樣一個運動在國民黨內發展起來，我們是準備贊助並與牠合作，而組成一反帝聯合戰線如同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那時候一樣。我們相信這是拯救我們國家的唯一道路。假使這樣一個綱領實現了，我們用不着怕日本。日本帝國主義是不能打敗一個真正統一的，武裝的與有組織的中華民族。

却是，在當前，日本是盼望組織成牠自己的反共戰線的。這實際上就是要征服中國人民的戰線。我們要組成一個民族解放戰線，這戰線的成功也將要就是反日鬥爭的勝利，最後也就是世界和平的勝利。只有在這樣一個勝利之下，中國的民衆方能與世界上一切自由的人民手攜着手地前進。

我問：你所說的「代議式的」政府，到底是什麼？舉個例：你對於選舉權所堅持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是什麼？

毛答：選舉應該是普遍的，沒有財產，地位，教育和性別的任何限制。

我問：如果這一綱領被南京接收了，紅軍是不是要改變牠的名稱而服從南京較高當局的命令？

毛答：我們承認（在過去的談話中已提及）在反日戰爭中，全國的軍隊一定要有統一的指揮，但是我們也相信軍事委員會一定要用代表制。這必須着重申明，只是在反日民族解放戰線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有些國民黨員也談到「統一」，但却不贊同民族解放與反帝運動。實際上是很明白的，沒有真正的反帝鬥爭，就不會使國家統一。

紅軍是否改變牠的名稱，這要看聯合的情形來決定。

我問：這新政策是不是說，共產黨承認在完成階級革命之前，必須先達到民族解放？

毛答：在過去和現在，共產黨向來的原則之一，就是在目前階段上，必須努力去實現反帝鬥爭，所以我們着重反日的民族鬥爭，根本上並不是代表什麼新的提綱。同時，如已經指出的，我們相信，只有同時實現被壓迫農民的解放和實現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第三項，這就是擁護工農利益，反日運動才能有效力。

我問：聯合戰線政策是不是就是說，共產黨願意放棄或無期延緩沒收地主們的土地和把土地重新分給與貧苦的及無地的農民。

毛答：這也是要依靠着反日運動的發展來決定。却是，我們相信，如不救濟農民，則反日綱領是不能夠實現的。你知道，土地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性質，這是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我們反對帝國主義，但是，我們並不是反對現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一原則。是符合全國一切民主份子的要求而是我們所誠心贊助的。

我問：是不是在這個基礎上實現的聯合的戰線實效方面等於立即向日宣戰呢？

毛答：是的，十分可能的，倘若重新聯合今日宣佈了。戰爭也許明天開始。

我問：如此是不是現在如果蔣介石真的有意和日本交戰，然後才有可能意料到南京方面接受這個主張呢？

毛答：是的，那是根本的定理。同時那也是我們沒有把握的一點；此所以蔣介石動搖延宕，並也許還想完全避免達到這種協定。

我問：在過去兩三月中甚麼事件使共產黨的政策產生新的決定？你所說的三點是已經存在了好幾年的客觀條件，不過漸次地加緊了，是不是呢？是否有一種直接原因決定着這些新的提議？這些提議一定要看作十年來你們的黨內歷史最重要的一個決定？

毛答：直接的原因是日本侵略的大大的加速：嚴重的日本新要求，對於這種要求的屈伏一定妨害未來的抵抗的任何努力極巨；以及對於日本侵略加深以人民的愛國運動為方式的普遍反感。這些條件也隨着使南京某些份子的態度發生變動。在這種情狀之下，是可能希望如我們所提議的那種政策的實現；但以這種方式一年以前或

還早些提了出來，全國以及國民黨都還不會有着準備來接受它。

目前交涉已在進行中；同時共產黨對於說服南京抗日並不抱着大的絕對的希望，雖然這是可能的。祇要還有可能，共產黨將準備在一切必要的方案內合作。倘若蔣介石準備繼續內戰，紅軍將也準備與之周旋。

完。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一日譯畢。願，上海。